

唐代涼州西通安西道驛程考

嚴 耕 望

目 次

- | | |
|-------------------|---------------------|
| 序言 | (四) 漢隋間西域諸道及其與唐道之關係 |
| (一) 涼州至安西間行程概略 | (五) 長安安西道在交通上之重要性 |
| (二) 涼州西至瓜州玉門關之驛程 | (六) 結論 |
| (三) 玉門關西至安西之驛程與捷道 | 附唐代涼州安西道驛程圖 |

序 言

涼州（今武威）爲盛唐時代西北地區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之中心，極爲繁榮。安西都護府（今庫車）則唐代前期中央政府控制西域之總部。其間相去五千里，有道通達，爲唐代西通西域中亞之交通孔道，亦唐代前期控制西域中亞之工具也。故此道允爲當時國際交通之第一重要路線，全程皆置驛。岑仲勉前輩云，玉門以西，漢唐不見驛傳之記載；偶失檢照耳。今就此道所經，凡州、縣、軍、鎮、關、戍、館、驛，有可考者，皆表而出之，以明此道之正確路線，並略及交通繁榮之概況。前撰長安西通涼州兩道考（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四卷第一期），取與此文參看，長安西至安西之交通情況皆可瞭然。其間行程七千里，急行一月可達，而西州（今吐魯番東六七十里）市場所見內地出產品之價格，並未達到昂貴驚人之程度，此與長安涼州兩道考所引水部式，會寧關黃河渡口具舟五十艘、渡子殆二百人者，皆足見當時長安西域間交通暢盛、商貿發達，誠非千載以下之今日所能想像也。

民國六十年六月二十日

(一) 涼州至安西間行程概略

由涼州向西微北行，五百里至甘州（今張掖縣），又四百里至肅州（今酒泉縣），又五百里至瓜州（今苦峪城或布隆吉城地區），又三百里至沙州（今敦煌縣）。去涼州約一千七百里，去長安約三千七百里。

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目，述秦州向西路程，歷渭、臨、蘭三州，至涼州。續云：

「涼州又五百一十里至甘州，又四百里至肅州，又九十里渡玉門關，又四百二十里至瓜州，又三百里至沙州。」

此條記涼州西經甘、肅、瓜三州至沙州。今就通典、元和志、寰宇記及舊唐書地理志表列此各州間之距離及各州至長安之里程如下：

	通 典	元 和 志	寰 宇 記	舊 唐 志
涼州至長安	2020	2000		2010
涼 甘 間	500 500	500	500 500	
甘 肅 間	2510	2500	2500	2500
甘 肅 間	420 420	400 400	420 420	
肅州至長安	3968[2968] (去洛陽3780)	2900	2900	2858 (去洛陽3780)
肅 瓜 間	526 526	480[500]	526	
瓜州至長安	3384	3400	3384	3310
瓜 沙 間	280 280	300 300	280 280	
沙州至長安	3759 (去洛陽4609)	3700	3859[3759] (去洛陽4609)	3650

上表所列數字，各書雖偶有小誤，然各書皆並記東至洛陽之里數。唐宋志書，長安洛陽間通常皆云八百五六十里，故此所記至長安里數如有可疑，往往可據至洛陽里數作最少之更正，如表中〔 〕內數字是也。檢此各州去長安之里數

大抵即等於本州東至鄰州之里數加鄰州東至長安之里數。換言之，即此道誠如武經總要所示，由涼州西經甘州、肅州、瓜州至沙州也。此諸州間之距離，大抵寰宇記採自通典，然元和志最為整齊，且各數亦最勘合無歧紛。且中古里程未必皆經準確測量，邊區當更就大體約計，與其取崎零數字，而彼此乖違，反不如據元和志僅取大數之為佳也。是則由涼州五百里至甘州，四百里至肅州，五百里至瓜州，三百里至沙州，沙州去涼州一千七百里，去長安三千七百里。此與通典、寰宇記所記涼沙間一千七百二十六里，武經總要所記涼沙間一千七百二十里，雖小有差異，但大數不爽，可無深論矣。

沙州折北微西取稍竿道七百里至伊州（今哈密縣），又由瓜州西北取第五道經莫賀延磧，九百里亦至伊州。玄奘西行取瓜州伊州道。其後稍竿、第五兩道交替置驛，蓋因軍政情勢而異也；然取莫賀延道為多。

玄奘行程，見慧立慈恩法師傳，詳後引。元和志四〇、寰宇記一五三關於伊、瓜與伊、沙間行程及伊州去長安、洛陽里程之記述如下：

元和志：沙州，「北至伊州七百里。」

伊州，「東南至上都四千四〔三〕百三十里。」

「東南至東都五千一百六十里。」

「東南取莫賀磧路至瓜州九百里。」

「正南微東至沙州七百里。」

寰宇記：瓜州，「西北至伊州九十〔百〕里。」

伊州，「東南至長安三〔四〕千三百里。」

「東南至西京（即洛陽）五千一百五十里。」

「正北〔南〕微東取稍竿館路至沙州七百里。」

據此，瓜州西北取莫賀磧至伊州九百里，即沙州圖經之莫賀延磧第五道也。沙州正北微西取稍竿館至伊州七百里，即沙州圖經之稍竿道也。兩道交替置驛情形，可考見圖經，並詳後文。

又觀兩書記伊州至洛陽之里程僅差十里，自可信。而去長安之里程一作四千四百三十里，一作三千三百里，差誤極大。按長安洛陽間相距八百五六十里，故

志文四百當爲三百之譌，記文三千當爲四千之譌，即一作四千三百三十里，一作四千三百里，無大異矣。前論瓜州至長安三千四百里，沙州至長安三千七百里，則兩書記伊州東至長安、洛陽之里程似係就莫賀磧道而言，即由伊州東南直達瓜州，非取梢竿道繞沙州而言也。蓋莫賀延磧道尤爲幹線。且考之唐人行程，如玄奘由瓜州取莫賀延道至伊州，見慈恩法師傳卷一。岑參有日沒賀延磧作（見後引），是亦取此道也。又舊八四裴行儉傳，爲送波斯王，經莫賀延磧至西州，亦其證。而未見有由沙州取梢竿道至伊州者，蓋取莫賀延磧道爲多也。伊州向西微南至西州，（今吐魯番縣東七十里之阿斯塔拉，或此四十餘里之哈喇和卓。）唐宋志書云七百三十里或五十里，實則伊西間交通有南北兩道，皆當九百里有奇，非七百數十里也。

慈恩法師傳，由瓜州經莫賀延磧至伊州，更向西至高昌，即西州也。通典一七四，伊州「西至交河郡七百五十里。」西州交河郡條，方向里數皆合。寰宇記伊州、西州兩目亦皆作七百五十里；而伊州目作「西南至西州」，方向較準。元和志四〇伊州、西州兩目作「東北」、「西南」向，里數皆爲七百三十里。似伊西兩州間不過七百三十里或五十里者。其實不然。茲先就唐宋志書所記伊西間之里數及兩州東至長安之里數，續作表如次：

	通 典	元 和 志	寰 宇 記	舊 唐 志
伊 州 至 長 安	4800 (去 <u>洛陽</u> 5650)	4430[4330] (去 <u>洛陽</u> 5160)	3300[4300] (去 <u>洛陽</u> 5150)	4416 (去 <u>洛陽</u> 5330)
伊 西 間	750 750	730 730	750 750	
西 州 至 長 安	5265[5365] (去 <u>洛陽</u> 6215)	5030 (去 <u>洛陽</u> 5000)	5367 (去 <u>洛陽</u> 6215)	5516 (去 <u>洛陽</u> 6215)

按通典、舊志，伊州去長安里數各與本書瓜、沙去長安里數不相應，姑存不論。其元和志、寰宇記，伊州去長安之里數雖皆有譌，然可據去洛陽之里數校正，上文已言之。至於伊西間里數，三書記載極相近，而西州至長安之里數，則相差甚遠。就中元和志所記里數，本身前後最無矛盾，似「730」「5030」兩數字最爲正確。然按通典、寰宇記、舊志所記去長安里數雖頗參差，但去洛陽里數則皆作六千二百一十五里。以兩京間八百五十里計之，西州至長安當爲五

千三百六十五里，則寰宇記所記最正確，而通典「二百」爲「三百」之譌也。是伊西間相去殆千里有零。後文引新志納職縣條所記里程，伊州西至赤亭鎮已七百里，赤亭以西又當二百餘里，即伊西間當近千里，最少九百里有奇，作七百數十里者皆非也。詳後文。

又由沙州西北行取大海流沙道一千三百六十里亦至西州，惟行旅蓋少。

此見西州圖經，通典、元和志、寰宇記亦有記載，考詳後文。

西州西南行七百二十里至焉耆國（今焉耆縣），置焉耆鎮，爲安西四鎮之一。又西約八九百里至龜茲國（今庫車縣），置安西鎮及安西都護府，爲統治西域之總部。東去涼州大數約近五千里，去長安大數約近七千里。

元和志四〇，西州「西南至焉耆七百二十里。」而通典一七四，西州「西至焉耆鎮守軍七百一十里。」安西郡、安西都護府「東至焉耆鎮守軍八百里，去交河郡七百里。」謂焉耆去交河郡大數七百里也。寰宇記一五六西州條及安西都護府條，並與通典同，惟無「去交河郡七百里」一句。按西州至焉耆實爲七百二十五里，詳後文，今據元和志書之。焉耆至安西，通典及寰宇記皆作八百里，舊唐志亦爲八百里，然通典焉耆國傳及寰宇記焉耆國傳皆作九百里。實考之，當爲八百三十里，八百九百皆大數也。詳後文。

綜上所書，伊州至涼州取莫賀延道二千三百里，取梢竿道二千四百里，加伊州至安西約二千五百里，又若涼州至長安取秦州道，則安西至長安約六千八百數十里，或六千九百數十里，即大數約七千里也。而通典一七四，安西都護府「至西京七千六百里，去洛陽八千三百三十里。」又一九一龜茲傳，「東去長安七千五百里。」又一九二焉耆傳「去長安七千三百里。」與今所考之數頗異。按漢書西域傳，龜茲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焉耆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明通典襲用漢代計程，非唐代記程也。（且漢書西域傳記程取鄯善道，亦非取伊吾車師道，詳後文。）

此爲長安通西域之大道。唐人行旅所經之能詳考者，莫過於玄奘與岑參。玄奘由長安經秦州、蘭州、涼州、瓜州、玉門關，渡莫賀延磧，經伊吾（伊州）高昌（西州），又經焉耆、龜茲而西。岑參由長安逾隴坂、大震關、分水驛，經渭州、臨州、蘭州，至

唐代涼州西通安西道驛程考

涼州，又經肅州、玉門關，渡莫賀延磧至西州，亦曾到沙州；西州又西經銀山、焉耆、鐵門關，至安西。全在此道上。

玄奘行程詳慧立慈恩法師傳卷一。

岑參來往長安、安西間，吟詠最多，茲就全唐詩第三函八冊所收各詩之詩題涉及沿途地名者，自東而西表列於次：

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參集一）

經隴頭分水（參集四）

西過渭州見渭水思秦州（參集四）

臨洮客舍留別祁四（參集三）

發臨洮將赴北庭留別（參集三）

臨洮泛舟趙仙舟自北庭罷使還京（參集三）

題金城臨河驛樓（參集三）

河西春暮憶秦中（參集三）

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參集二）

武威春暮聞宇文判官西使還已到高昌（參集三）

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參集一）

武威送劉判官赴磧西行軍（參集四）

過燕支寄杜位（參集四）

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參集二）

過酒泉憶杜陵別業（參集三）

玉關寄長安李主簿（參集四）

題苜蓿峰寄家人（參集四）

日沒賀延磧作（參集四）

過磧（參集四）

磧中作（參集四）

敦煌太守後庭歌（參集二）

經火山（參集一）

火山雲歌送別（參集二）

銀山磧西館（參集二）

早發焉耆懷終南別業（參集三）

題鐵門關樓（參集一）

宿鐵關西館（參集三）

安西館中思長安（參集一）

觀此諸詩，其行程可瞭。其地名爲前文所未考者，首蓿峰與玉關相近，火山在伊州至西州道側，銀山在西州至焉耆道上，鐵門關在焉耆至安西道上，皆下文續詳。

今就涼州至安西五千里之詳細行程續考如次：

（二）涼州西至瓜州玉門關之驛程

涼州西北行一百八十里至番禾縣，更名天寶縣（今永昌縣西）。

元和志四〇涼州，「天寶縣，東至州百八十里。本漢番禾縣，屬張掖郡。北涼沮渠蒙遜立為番禾郡。後魏太武平涼州，罷郡置軍，開皇三年改為縣，……天寶中改為天寶縣。」按觀此縣地望與歷史名稱，應當大道。又嘉麟縣，「東南至州七十里。……前涼張軌於此置武興郡，後梁呂光改置嘉麟縣。」亦可能在道上，今姑不書。

又西北越刪丹嶺（今水泉子），經漢日勒故城（今古城窪），凡二百里至刪丹縣（今山丹縣），在焉支山北五十里，弱水之北，置刪丹鎮。

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下邊防西蕃地界條，涼州「西甘州五百里。西北三百里先至甘州刪丹縣，又二百里至州。」是兩州間道經刪丹也。然元和志，甘州「刪丹縣西至州一百二十里。」寰宇記一五二甘州，「刪丹縣，(州)東北二十里。」考道宣神州塔寺感通錄卷上，「甘州刪丹塔……在甘州東一百二十里，縣城東，弱水北，大道側。」足證元和志記載不誤，寰宇記「北」爲「百」之音譌；武經總要記程則誤也。元和志又云，刪丹縣「弱水在縣南山下。」觀塔寺感通錄信然。通說，古刪丹城即在今山丹縣治，觀去甘州里距及弱水之北，確

然不誤。又元和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故以名縣。山在縣南五十里，東西百餘里，南北二十里，水草茂美，與祁連山同。」是縣南山下，即焉支山之北麓耳。岑參過焉支寄杜位云，「焉支山西酒泉道，北風吹沙卷白草。」（全唐詩三函八冊）。蓋謂刪丹縣也。

羅振玉莫高窟石室秘錄，寺歷三卷有康公者，書銜「大唐前河西節度押衙銀青光綠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甘州刪丹鎮遏使充涼州西界遊奕防採營田都知兵馬兼殿中侍御史。」時在中和元年。則刪丹置鎮。

通鑑一一二晉隆安五年，楊顥諫涼王纂曰：「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胡注：「姑臧南有洪池嶺，西有丹嶺，一作刪丹嶺。」是涼甘間有刪丹嶺。紀要六三山丹衛，「日勒城在衛東南，漢縣，屬張掖郡。……獻帝分置西郡，治日勒縣。晉亦爲西郡治。志云，自姑臧西北出張掖，其間有大嶺，度嶺而西，西郡當其要。嶺謂刪丹嶺也。」又涼州衛目洪池嶺條：「自刪丹嶺以西謂之嶺西。張氏以後，西郡、張掖、酒泉、建康、晉昌皆謂之嶺西地。」按日勒縣、西郡在刪丹縣東南。寰宇記一五二刪丹縣條，「日勒城，漢爲日勒縣，故城在今縣東南。」是也。則刪丹縣在嶺之西。復檢西北叢編卷三（民國八年二月二十九、三月一日條）：「早發永昌縣，晚宿水泉驛，計行六十里。」「驛地高七千七百呎。」又西二十五里至「古城窪，入山丹縣界。……漢朝之日勒縣也。……十里定羌廟，……南北兩山脈至此漸近。又行平地十五里山丹峽，大石當道。五里峽口驛。」又八十里至山丹縣。按漢日勒縣當爲古代大道所經，則刪丹嶺當即今之水泉子，爲涼甘道上之最高處也。

五代時期，大食作家依賓墨哈黑爾所記之 Sandabil 稱爲支那國都者，其城極爲宏大，水利建設優良，殆即甘州回鶻所都，似亦即唐之刪丹城也。

岑仲勉前輩誤傳的中國古王城與其水力利用（中外史地考證下冊，原刊東方雜誌四十一卷第十七期）引大食作家依賓墨哈黑爾（Ibn Muhalhil）遊記費瑯法文譯本云：

「吾人於是到達關口，地在沙磧中，支那王遣衛戍守此。凡從各突厥國或他處來欲進支那境者，須在此請准。吾人前行三日，受國王名義之招待。每歷一

程，即換乘牲畜。吾人於是抵驛谷，在此又須請准而後得前進，故使臣輩別吾人先行。隨後得到允許，經過河谷，其風景優美為世界之冠。行凡三日，都享受國王之招待。次越過河谷後行一整日。次吾人下向 Sandabil 城。此是支那之國都，行政機關所在。是夜，吾人於距城一日處住宿。翌日黎明即起程，直至日落然後到達。」

「是城（如此）宏偉，故需一日（之程）乃能（橫過）之。內計六十街，每街各延達於官署。吾人往遊一（城）門，知其牆高厚各九十臂。牆上有一大川，分為六十支流，每支流向一闢流去，衝動一個轉水之風輪，於是別風輪，又將水捲流至地面。由是渠水之一半流出牆外而灌溉田園，他半則導向城中以供給（渠水所經之）街上居民及（街道所向之）官署之用水。後此（渠水）達到街之他端，（最後）流出城外。因是之故，每街有兩條流渠。全街上兩流渠之流向係一順一逆。其由城外流向城內之渠，所以供飲；其由城內流向城外者，載（居民之）污穢以去。」「國有一大寺。國內行政扼要，法律嚴明。寺比耶路撒冷之教堂更大，內有刻像，肖像，偶像，及一大佛。土人不殺（牲為食），全不食肉。有人殺生者犯死刑。（此城）同時為印度人及突厥人之都城。」（費瑯極東史料）

按此遊記約成於十世紀中葉，當中國五代之世。所謂支那王城，或指為長安，或指為成都，顯非其他。馬迦特指為甘州，近之。仲勉前輩云，Sandabil 為刪丹城，即甘州回鶻都城所在。按此文首云「到關口，地在沙磧中。」由關口到此城八日程。五代玉門關在肅州西二百里，（詳後文。）去刪丹約七百里。正當八日程。對音亦最近，故岑說最可取。但岑先生又以為刪丹城太狹小，不足當此大城。乃引甘州府志：「刪丹古城，明一統志曰在今衛南一百二十里，燕支山下。按在今扁豆口內，近馬營屯地。」望按此未必然。考紀要、一統志、甘肅通志皆以唐代刪丹古城即在今之刪丹縣，非另有一城。且元和志明云刪丹縣在甘州東一百二十里，寰宇記亦同（詳前），正即今縣地，不得在今縣南一百二十里，去甘州二百四十里也。蓋明統志本意謂古城在甘州東南一百二十里，亦即今山丹城附近，此本舊說，而誤書之，府志遂沿誤，以為在今刪丹縣南一百二

十里扁豆口內馬營屯耳。(註一)按前考刪丹縣在焉支山脈北只五十里，又侍行記四云：「出山丹南門，經西南關，過山丹河……十里大佛寺。寺在獅山，一名石礫岩，大佛負山面東，高十三丈，覆屋七層。」則縣城固近頗高之山。又明人陳棐山丹詩云：「綠水穿城入圃畦。」清人高元振山丹弱水賦云：「旣屈曲以繞城，亦灤廻而穿郭。」(岑文引府志一四)又府志六：「山丹五大壩，曰草湖渠，分十三壩；曰緩泉渠，分五閘。」西北叢編卷三，至「山丹縣。午尖於南關外。城周七里，只有東南兩門，……沿關商戶皆臨渠而居。」正與前引 Sandabil 城水利情形相合。復次，林則徐荷戈紀程，到山丹後記云：「連日所過大路之旁，多依山爲牆，係明代所築邊牆。」又叢編述山丹峽西之峽口驛云，「城長方形，一面倚邊牆，周三里。」正卽城牆依山建築之一例，依賓所記 Sandabil 牆高九十臂，牆上有大川者，正可據此兩條，想像其彷彿。而山丹城近山，固能有此水利建設也。

刪丹又西一百二十里至甘州治所張掖縣(今縣)，在弱水(今張掖河)南二十三里。甘州南通吐蕃，北達居延至回鶻衙帳，爲河西重鎮之一，刺史兼充河西節度副使。且置張掖守捉，管兵六千三(五)百人。

刪丹至甘州方向里數，見元和志及寰宇記，前已引述。寰宇記一五二甘州張掖縣，「弱水東自刪丹縣界流入，在州北二十三里。」

甘州南通吐蕃，另詳大斗拔谷道考；北通居延、回鶻衙帳，另詳甘瓜北通居延、回鶻道考。

新六七方鎮表河西欄，景雲元年，「置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督察九姓部落赤水軍兵馬大使，領涼州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副使治甘州，領都知河西兵馬使。」天寶四載，「以張掖太守領河西節度副使。」是其在軍事上之地位僅次於涼州也。

通典一七二河西節度使統軍有「張掖郡守捉，東去治所(涼州)五百里，管兵六千三百人，馬千匹。」元和志同，惟「三百」作「五百」。而舊地志云，

註一：府志指謂衛南、卽山丹衛南，故云在扁豆口內，近馬營屯。岑氏引此，又誤會爲甘州南一百二十里，見隋唐史貢四三〇。其實馬營屯去甘州治二百里以上。

「張掖守捉在涼州南二里，管兵五百人。」新志涼州目亦云：「南二百里有張掖守捉。」蓋皆誤也。通鑑二一五天寶元年胡注云：「張掖守捉在涼州南二百里，管兵五百人。」蓋即據舊志爲說也。今據通典、元和志書之。按張掖爲甘州治所，正在涼州西五百里，則此軍即在甘州城也。

州南有鞏筆驛。

舊玄宗紀上，開元十五年閏九月，「迴紇部落殺王君奐于其州之鞏筆驛。」舊一〇三王君奐傳，判涼州都督。回紇護輸「謀殺君奐」，「會吐蕃使間道往突厥、君奐率騎往肅州掩之，還至甘州南鞏筆驛，護輸伏兵突起，……遂殺君奐。」通鑑二一三，同。在甘州南，似當在甘州至刪丹道上。然新唐志，甘州張掖縣「西有鞏筆驛。」胡注亦云：「甘州張掖縣西南有鞏筆驛。」則又當在甘州西行之道上。要去甘州城不遠。

甘州西行一百九十里至建康軍（今高台縣西南四十里），管兵五千三百人。在祁連山北麓，相近有祁連戍。

通典一七二，「建康軍，張掖郡西二百里，證聖初王孝傑置，管兵五千二百人，馬五百匹，東去治所七百里。」元和志四〇，「建康軍，證聖元年，尚書王孝傑開鎮，周廻以甘肅兩州中間濶遠，頻被賊鈔，遂於甘州西二百里置此軍，兵五千三百人，馬五百匹，東去理所七百餘里。」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下，西蕃地界目，「建康軍在(甘)州西二百里，即甘肅兩州中路，在祁連山下。」是此軍當在甘肅二州間大道上。註二元和志於甘州目云：「建康軍在州西北一百九十里。」即此軍。新地志，甘州「西北百九十里，祁連山北有建康軍。」下文與元和志略同。蓋實一百九十里，二百乃大數耳。按元和志，甘州張掖縣，「祁連山在縣西南二百里，張掖、酒泉二（郡）界上，有美水茂草，山中冬溫夏涼，宜牛羊。」則軍誠在祁連山北麓矣。

按建康爲東晉十六國時代之郡名，引詳一統志甘州卷古蹟目。同目又云：「建康故城在高臺縣南。……名勝志，城在高臺所西南四十里。舊志，建康軍城在所東南十里。」按甘肅兩州距離，今里四百三四十里。而高臺在肅州東南二百

註二：舊志云：「建康軍在涼州西百二里，管兵五千三百人，馬五百匹。」涼亦甘之譌，百二當乙作二百。

七十里，在甘州西北一百六七十里。唐世，此軍略當兩州中途，則名勝志云在高台西南四十里爲近實。祁連戍詳下條。

又西，道出崆峒山北，鹽池（今明海湖）之南，一百一十里至福祿縣（蓋今新橋堡、龍興關地區），又西北一百里至肅州治所酒泉縣（今縣）。

元和志肅州，福祿縣「西至州一百里。本漢樂涫縣。……崆峒山在縣東南六十里，黃帝西見廣成子於崆峒，漢武帝行幸雍，祠五畤，遂登崆峒，並此山也。」寰宇記一五二，略同。元和志又云，「鹽池在縣東北八十里，周廻百姓仰給焉。」新志，鹽池方向里數同。觀此形勢，崆峒山當爲祁連山脈之北麓一山名，大道當經其北。鹽池則在道之北頗遠。檢國防研究院地圖，元和志所記之鹽池，當即今之明海湖。福祿縣則今金佛寺、新橋堡、龍興壩地區。又檢一統志肅州卷關隘目，「金佛寺堡在州東南九十里，東至清水堡五十里，城在近山，周二里四十丈。」則唐之福祿縣即當在此堡東北新橋堡龍興壩地區。甘肅兩州相距約四百里，建康東去甘州一百九十里，福祿西去肅州一百里，則此二地間當爲一百一十里也。

元和志又云，「祁連戍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新志，同。岑參有過酒泉憶杜陵別業（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三）及酒泉太守席上作（同上集四）。其憶杜陵別業詩云：「昨夜宿祁連，今朝過酒泉。」此祁連殆卽指戍而言，是亦當道。則地望與建康軍相近。紀要六三甘州鎮，「祁連城在鎮西北百九十里。晉永興中前涼張祚置漢陽縣以守牧地。張元靚改爲祁連郡，呂光因之。唐開元十六年，吐蕃寇甘州，涼州將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下，即故城也。胡氏曰，城在祁連山旁。」蓋得之。城在甘州西北一百九十里，正卽建康軍地也。

又由甘州略循弱水卽張掖河西北行三百餘里至福祿縣界之鹹池烽，蓋在鹽池之東。又西南二百三十餘里亦至肅州。

通典一七四甘州張掖郡，「西北到酒泉郡福祿縣咸池烽東張掖河三百五里。」肅州酒泉郡，「東北到張掖郡鹹池烽二百三十二里。」寰宇記一五二，同。則甘州西北略循張掖河經鹹池烽亦至肅州，凡五百數十里，鹹池當即指福祿縣東北八十里之鹽池而言，則烽在鹽池之東，約當今馬連井地區。此可視爲北道，

行程五百數十里。唐宋志書，甘肅間例云四百里，或稍多。惟高居誨使于闐行記（五代史記七四于闐傳引）云，「甘州……西北五百里至肅州。」豈取此道耶？今日鐵路線似略取此道。

州置酒泉守捉，蓋在城區。其西南八十里有崑崙山，傳爲周穆王會西王母處。東北四十里有白亭海，爲衆水所會，蓋今臨水堡地區。

新唐志肅州酒泉郡，「有酒泉、威遠二守捉城。」酒泉守捉蓋即在州左近。元和志，肅州酒泉縣，「崑崙山在縣西南八十里，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此山。」一統志肅州卷山川目，引括地志亦云縣西南八十里。按寰宇記一七二肅州酒泉縣，「崑崙山在縣西南八十里。十六國春秋云：後魏昭成帝建國十七年，前涼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刪丹西河名曰弱水，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此傳說所自始。

元和志：酒泉縣，「白亭海在縣東北四十里，一名會水，以衆水所會故曰會水，以北有白亭故曰白亭海。方俗之間，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外有水，便名爲海。」

寰宇記一七二：酒泉縣，「會水一名白亭海，在縣東北三十里。十三州志云，衆羌之水所會，故曰會水，北有白亭，俗因謂之白亭水也。」檢國防研究院地圖，酒泉縣東有臨水堡，爲衆水之會。西北叢編卷三，臨水驛在縣東四十二里，驛縣間「人烟稠密，道路平坦，農事發達。」意者唐之白亭海即在今臨水堡地區也。

肅州西行一百里至天門關（今嘉峪關西黑山下），五代時見，蓋即北宋時代所謂玉門關也。又西約一百二十里至玉門縣（今縣東頗遠，蓋赤金峽赤金堡地區），曾置玉門軍，管兵五千二百人。五代時置玉門關。

高居誨使于闐行記（五代史記七四于闐傳引）云：

「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西至瓜州。」

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上邊防述秦州通沙州道云：

「肅州又九十里渡玉門關，又四百二十里至瓜州。」

同書一八下西蕃地界條云：

肅州「西至玉門關七十里，又四百一十里瓜州。」

據此，五代時期，肅瓜間有天門、玉門兩關，而北宋時代記事，所謂玉門關者，即五代之天門關無疑。地望約在肅州西八九里，大數一百里也。日本栗棘庵所藏宋代輿地圖石刻拓本云，「甘州東南至涼州五百里，西至玉門關四百九十里。」按甘州至肅州四百里，是亦謂玉門關在肅州西九里也。此爲宋末刻石，仍承北宋舊說言之。檢一統志肅州卷關隘目，「嘉峪關在州西七十里嘉谷山麓。」又西北叢編三，肅州至嘉谷關六十里。「有天門關址，在黑山下。」又云出嘉谷關三十三里至黑山湖軍塘。則五代天門關即宋玉門關，正當今黑山地，而五代玉門關則在黑山西約百里也。

又元和志四〇肅州，「玉門縣，東至州二百二十里。本漢舊縣，屬酒泉郡。漢罷玉門關屯戍，徙其人於此，因以名縣。後（魏）孝明帝改爲玉門郡，周武帝省入會川縣。開皇十年復爲玉門縣，皇朝因之。……開元中，玉門縣爲吐蕃所陷，因於縣置玉門軍。天寶十四年，哥舒翰奏廢軍重置縣。」寰宇記一五二，云在州西二百里。蓋就大數而言。又引十三州志云：「玉門縣置長三百里石門周匝山間，裁經二十里泉流入延興。」云云，記其形勢頗詳，惜有奪誤。

又考通鑑一五九梁中大同元年，魏以史寧爲涼州刺史；前刺史文仲和據州不受代。瓜州民張保殺刺史應之，晉昌民呂興殺太守以郡應保。保使主簿令狐整將兵東救仲和。「整行及玉門，召豪傑述保罪狀，馳還襲之，先克晉昌，斬呂興，進擊瓜州，……保奔吐谷渾。」胡注以爲即此玉門縣，是也。則縣當大道，五代高居誨所記之玉門關亦在肅州西二百里，其爲一地無疑，蓋唐末五代就漢舊縣置玉門關耳。

元和志「玉門軍，肅州西二百餘里，武德中楊恭仁置，管兵千人，實三百人，馬六百匹，東去理所（涼州）一千一百餘里。」通典一七二，略同。惟作「五千二百人」又無「實三百人」之語。舊志亦作「管兵五千二百人，馬六百匹」，蓋盛時管五千餘，後乃減少耳。

至其今地，一統志安西州卷古蹟目云：「玉門廢縣在今縣東，漢置。…通志，今赤金所去肅州二百三十里，與古玉門關道里相仿，蓋即玉門縣地。」勞貞一先生兩關遺址考（史語所集刊第十一本）云，赤金所在赤金湖畔。殆即國防研究院地圖之赤金堡。按楊炳堃西行記程（咸豐元年），肅州西行二百四（？）十五里至赤金湖，又二十里赤金臺，又二十里赤金峽，又五十里至玉門縣。西北叢編卷三，由肅州西行二百一十三里赤金湖，二里赤金墩，三十五里赤金河，又五里至赤金峽。又赤金湖南二十里有上赤金，又西二十里赤金堡，又西二十里，亦至赤金峽。赤金峽又西五十里至玉門縣。則赤金地名甚多，皆在今玉門縣東一百里左右。檢寰宇記，玉門縣有金山。引九州要記云，「山有赤彈水，堪爲漆用。」又引十三州志云：「延壽縣在郡西，金山在其東。」則古玉門縣即有金山、赤水，誠可能即在今赤金地區也。且西北叢編云：「南北山勢由西趨東，至赤金峽，相距最近，形勢頗要，明戍邊將士常禦寇於此。」此其形勢，與前引十三州志頗相合，更增加古代設軍關縣治之可能矣。且下文論定，唐代瓜州不在布隆吉城，即在鎖陽城一名苦峪城；玉門縣在州東三百里，亦勢不得在赤金峽以西也。

又西蓋經沙頭故城（今玉門縣西），凡約三百里至瓜州，（今苦峪城，俗名瑣陽城，亦可能在布隆吉城。）在苦水之南十餘里。唐初玉門關在州西北五十里之瓠臘河（今疏勒河或窟窿河）上，後遷至瓜州城近處。

瓜州東至肅州約五百里，而玉門縣在肅州西二百里，故玉門縣至瓜州約三百里。

瓜州與唐代玉門關 瓜州亦稱晉昌郡，岑參有武威春暮聞宇文判官西使還已到晉昌詩（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三）。其地望前人說者最爲紛紜。茲引岑仲勉先生一段述論如次：

「西域圖志，『古瓜州在新瓜州西十五里，東距安西州治四十五里，有土城。』水道記三，『安西州城西南八十里有故瓜州城，唐以來所治也。』侍行記，『（安西）州西三十里新瓜州，三十里瓜州口。』今以斯坦因圖驗之，上文所稱古瓜州或瓜州口，約在安西州西南六十餘里。圖志云四十五，顯是失

入，水道記之八十，或即六十之筆誤。陶氏曾疑此非唐之瓜州。其說云，『元和志，瓜州……東南至肅州四百八十里，西至沙州三百里。今肅州至安西州六百六十里，又西至敦煌，即唐沙州二百七十里，乾隆時考古者（即指西域圖志）以安西州西南六十里之瓜州口爲唐瓜州，則東距肅州七百里，西距沙州祇二百一十里，較元和志所言相差太遠。俞浩西域考古錄疑之，以布隆吉爲唐瓜州，繼又云在雙塔堡，則近似矣。蓋布隆吉東距肅州五百里，較元和志多二十里，其西距沙州四百三十里，較元和志多一百三十里，左右未均。若雙塔堡，則距肅距沙較元和志各多數十里，……不甚懸殊也。』按依侍行記所載，雙塔堡至安西一百十三里，再加安西至敦煌二百七十里，共三百八十餘里，比元和志多八十餘里，而肅州至雙塔五百二十二里，比元和志只多四十餘里，仍是左右未均。況古地理書傳久失真，里數多誤，元和志所不免。……通典一七四『瓜州東至酒泉郡五百二十六里，……西至敦煌郡二百八十里。』又依本篇校正道里，肅州至瓜州應五百九十里，瓜州至沙州二百六十里，前者比通典多六十五里，後者比通典少二十里，未見得雙塔之比定較優。且古瓜州之稱，傳自明代，初非發生於西域圖志之考古。吾人尤須知者，塞地風沙無常，水源時變，行程曲直，屢有更改，古今旅程，固不易全融合也。』（從嘉峪關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紀程，刊入中外史地考證下冊。）

按岑先生最後數語極爲得體，然欲維持唐瓜州在今安西西六十里，去敦煌更近，無可解矣。今按唐之瓜州決不在今安西以西殆可斷言。就以上各說觀之，當以布隆吉城最爲可能，蓋里數既略相當，又有窟窿河河床之形式可證也。然岑文漏列一重要新說，即勞貞一先生云苦峪城，似較布隆吉說更優。茲就此二說分列於次：

考慧立慈恩法師傳云：

「晝伏夜行，遂至瓜州。……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瓠壘河，下廣上狹，廻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

是瓜州在瓠臚河南五十里。出瓜州經此河至西域。檢西域圖志二四窟窿河條云：

「窟窿河在安西州雙塔堡東，西距州城一百三十里，東西分流，經雙塔堡東，入蘇賴河。內多窟穴，上小下大，深邃不測，盤渦湍急，流不及遠。南爲土葫蘆溝，即窟窿河發源處也。」

「柳溝衛城，地名布隆吉，亦稱布隆吉城，窟窿河居其西。」

又西北叢編三，民國八年三月二十日條云：

「早發布隆吉爾城，……一里，出北門。……六里，過小河，即布隆吉爾水。三十里，過窟窿河橋，以源出土葫蘆村，故又名葫蘆水，西北流入蘇賴河。上狹下廣，迴波甚急。唐移玉門關於其上，今不見其址。西數十步即雙塔堡。或謂唐瓜州晉昌縣故址。證之元和志所云晉昌縣東二十步有玉門關頗似。」

按蘇賴河，國防研究院地圖作疏勒河（即布隆吉河）。又此圖，雙塔堡東布隆吉西有小水自南而北流入疏勒河，即此窟窿河。慈恩傳之瓠臚河可能即此窟窿河，蓋河牀特殊，最可比定也。若唐初之玉門關在此河上，則瓜州當在今布隆吉地區殆爲可信。西北叢編又云，布隆吉爾東「地味肥沃，甚類黑龍江省之平原。」其西至雙塔堡間，亦「一片膏原。」固宜爲古代州治矣。復按今道經布隆吉。檢明永樂十二年陳誠所撰西域行程記，所記西域大道已經卜隆吉，若唐道與明以下路線相同，則瓜州城必在此無疑。至於苦峪城之說，勞貞一先生兩關遺址考云：

「距肅州四百八十里，距敦煌三百里，只有苦峪城相符。清一統志云，『苦峪城在淵泉（即安西城）東南，東去嘉峪關四百二十里。』再加上嘉峪關至肅州六十里，恰爲四百八十里。今城爲明成化十三年修，但早已有遺址。徐松西域水道記云：『斷碑沒草，尋其殘字曰：「大興屯墾，水利疏通，荷鍤如雲，萬億京抵。」耆舊相傳，是張義潮歸唐部人所造，以述功德。』可證城之建造，至晚在明以前。現在本地人稱爲瑣陽城。……斯坦因的 Serindia 載發現的陶片，最晚到宋。所以此城決不太晚。此城爲安西屬內最大遺址，

明代所建，當仍舊基。照 Serindia 的圖，城距疏勒河可二十英里，與五十華里之數相近。斯坦因云，疏勒河即玄奘所經之瓠臚河。」

按此條引考古證據，以見苦峪城遺址既大且古，且北距疏勒河東去肅州之里距，皆極相當，誠極可能爲唐瓜州之遺址。向達兩關雜考亦疑苦峪城即唐代瓜州故址，且謂興水利之碑碣可能爲頌張守珪者。（見該文附註十一。刊見向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今按沙州都督府圖經云：

「苦水源出瓜州東北十五里，名鹵潤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餘里，西南流百二十里至瓜州常樂縣南山南，號爲苦水，又西行三十里入沙州東界故魚泉驛南，西北流十五里入常樂山，又北流至沙州階亭驛南，即向西北流，……散入沙鹵。」

則唐世有苦水，發源瓜州東北近處，經城北十餘里處，再西流入沙州境。疑今苦峪城即因苦水河谷而受名。論其地位，正與古瓜州之地望相當，可爲勞、向新說之一證。所當更進一步求證者，不知疏勒河之河牀形式是否與窟窿河略相似，亦即是否與慈恩傳所記瓠臚河之河牀略相符耳。（註三）今姑兩存之，然余頗傾向勞文新說，則唐道與明初以來大道不同也。

前引慈恩傳，唐初玉門關在瓜州北五十里。若瓜州在今布隆吉，則關當在其西三十里窟窿河之下流，接近入疏勒河地區。若瓜州在今苦峪城即瑣陽城，則關當在今小王堡之西，安西之東，疏勒河上。而元和志四〇，瓜州晉昌縣爲州郭下縣，「玉門關在縣東二十步。」則關又在瓜州治所，蓋後期移關就州耳。

又唐初及後期，此關既皆見置。岑參有玉關寄長安李主簿云，「玉關西望腸堪斷。」（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四）。則盛唐時代亦置。而六典云上中下關凡二十六，玉關不在其列，何耶？余嘗疑六典所載各事往往不盡，此亦爲強證。

苜蓿峰 岑參有題苜蓿峰寄家人云：「苜蓿峰邊逢立春，葫蘆河上淚沾巾。」葫蘆河當即慈恩傳之瓠臚河。西北叢編三云，唐玉關在窟窿河橋，橋西數十步爲雙塔堡。「堡北有苜蓿峰。」按推此詩意，苜蓿峰固有去玉關不遠之可能，

註三：余頗疑「苦」爲「瓠臚」之合音。水在城北十餘里，然關固可在城北之較下流，慈恩傳云州北五十里，亦不能看得太死。

然亦不能必。今姑書之如此。至其今地自因瓜州是否在苦峪城或布隆吉城而異。

沙頭故城 漢志有池頭縣，後漢作沙頭縣。三國魏志一八閻溫傳：河右擾亂，敦煌太守卒，功曹張恭代行長史事。「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就至酒泉爲華（酒泉黃華）所拘執，……恭卽遣弟華攻酒泉沙頭乾齊二縣。」又通鑑一一晉隆安四年，「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是沙頭當大道。三國志集解引李兆洛曰，「沙頭故城，今安西州玉門縣北少西一百十里，蘇賴河之南。」一統志則作縣西南。而紀要六三，肅州衛，「沙頭城在衛西二百五十里。」則在今玉門縣之東。今姑據一統志書之。

瓜州置墨離軍，統兵五千人，稱爲四鎮之東門，例以刺史充使，蓋在瓜州城或西北不遠處。

通典一七二，墨離軍，「晉昌郡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馬四百匹，東去治所千四百里。」此所謂「治所」指河西節度使治所之涼州而言。元和志四〇，同；惟「千」上皆有「一」字，又「四百」下有「餘」字。

考舊一〇三張守珪傳，「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羅振玉西陲石刻錄索勳紀德碑，授持節瓜州諸（缺。當爲「軍事瓜州刺史」數字）墨離軍押蕃（缺）。時在景福元年。同書李氏再修功德記碑，「次男，使持節瓜州刺史墨離軍押藩落等使。」是自盛唐時代，瓜州刺史兼領墨離軍使，遂爲恒例，故至唐末，仍存兼銜也。按西北通道上諸州城，或置軍或置守捉，如涼州城內置赤水軍，沙州城內置豆盧軍，甘州城有張掖守捉，肅州城有酒泉守捉，惟瓜州城不見軍或守捉，而刺史例兼墨離軍使，蓋此軍卽置於瓜州城也。通典、元和志，皆云此軍東至涼州一千四百里，正爲瓜州東至涼州之里數。至於「瓜州西北一千里」者，蓋誤書，或「千」爲「十」之譌文耳。或者疑「一千四百里」爲「二千四百里」之譌。然考敦煌名族志殘卷（羽田亨敦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陰氏條云：

「守忠充墨離軍副使。……涼州都督郭元振判錄奏：謀略克宣，勤勞久著，當王〔五〕涼之西面，處四鎮之東門。」

則此軍不在瓜州城，即在瓜州至伊州道上，故志書云在瓜州西北也。前考瓜州西北至伊州不過九百里。又寰宇記一五三，瓜州「西至伊州界吐蕃魯兒山四百五十里。」武經總要前集一八下，瓜州「西至伊州界五百里。」據沙州都督府圖經所記常樂至伊州驛道，自常樂至伊州界四百數十里，加常樂瓜州間一百一二十里（詳後文），正爲五百數十里。知總要所記甚確。則由瓜州至西北邊界不過五百數十里，不到六百里，墨離軍旣例由瓜州刺史所兼領，何得越界至伊州境，且或在伊州以北耶？此皆斷不可能。故最恰當之解釋，此軍當在瓜州城或其西北不遠處。玉門關在州城西北不過四五十里，或者軍即在玉門關，故當時視爲四鎮之東門也。

(三) 玉門關至安西之驛程與捷道

玉關又西約六十五里至常樂縣（今安西縣西），在苦水之北，置常樂驛。

元和志四〇，瓜州常樂縣，「東至州百一十五里。」寰宇記一五三作「一百五十一里。」按沙州都督府圖經苦水條：「西流至瓜州城北十餘里，西南流百二十里至瓜州常樂縣南。」疑寰宇記里數「五十一」爲「一十五」之倒譌耳。而縣城則在苦水之北也。縣置驛，見下文。瓜州至沙州驛道，及瓜州至伊州驛道，皆由常樂縣出發，亦詳下文。故知由瓜州經玉門關至常樂也。關縣間相距六十五里。其今地，舊說在安西縣西。就東西里距而言，蓋可信。

常樂西至沙州有南北兩道。南道由常樂縣驛西南行四十五里至魚泉驛，高宗咸亨四年置；又西二十五里至黃谷驛；又西四十里至空谷驛，在空谷山南；又西三十里至無窮驛，在無窮山。又西三十五里至其頭驛；又西二十五里至東泉驛；又西四十里至沙州城驛；在州城東二百步。永淳二年，廢山南之黃谷、空谷、無窮三驛，而於山北懸泉谷置懸泉驛，在懸泉水之東，東去魚泉驛四十里，西至其頭驛八十里。其地有懸泉城，及懸泉祠、寺，蓋爲驛道要衝。此皆南道也，取空谷驛路凡二百四十里，取懸泉驛路凡二百三十里。天授二年，以南道石磧山險，迂曲近賊，遂盡廢南道諸驛，改取北道置驛。北道由常樂驛正西行三十里至階亭驛，在階亭烽側；又西北二十五里至甘草驛；又西二十五里至長亭驛，在長亭烽下；又西南四十里至白亭驛，在白亭烽下；又

南二十里至橫澗驛，證聖元年增置；又西南二十里至神泉驛，後其旁置清泉戍，驛亦更名清泉；又西南四十里至沙州州城驛。北道行程凡二百里，大抵皆沿烽戍建置。

沙州都督府圖經（羅振玉鳴沙石室佚書本）云：

「州城驛 在州東二百步，……東北去清泉驛四十里。

清泉驛 在州東北四十里，去橫澗驛二十里。承前驛路在瓜州常樂縣西南。

刺史李無虧以舊路石磧山險，迂曲近賊，奏請近北安置。奉天授二年五月十八日勅，移就北。其驛置在神泉觀庄側，故名神泉驛。今爲清泉戍，置在驛傍，因改爲清泉驛。

橫澗驛 在州東北六十里，北去白亭驛二十里。刺史陳玄珪爲中間迂曲，奏請奉證聖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勅置。驛側有澗，因以爲名。

白亭驛 在州東北八十里，東北長亭驛四十里。同前奉勅移。爲置白亭烽下，因烽爲號。

長亭驛 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東去甘草驛二十五里。同前奏勅移。爲置在長亭烽下，因烽爲號。

甘草驛 在州東北一百四十五里，東南去階亭驛二十五里。前刺史李無虧爲中間路遠，兼有沙鹵，奏請奉勅置。驛側有甘草，因以爲號。

階亭驛 在州東一百七十里，東去瓜州常樂驛三十里。同前奉勅移。爲置在階亭烽側，因烽爲號。

東泉驛 在州東四十里，東去其頭驛二十五里。刺史李無虧爲其路山險迂曲，奏請就北安置。奉天授二年五月十八日勅，移就北，其驛遂廢。

其頭驛 在州東六十五里，西去東泉驛二十五里，東去懸泉驛八十里。同前奉勅移廢。

懸泉驛 在州東一百四十五里。舊是山南空谷驛。唐永淳二年錄奏，奉勅移就山北懸泉谷置。西去其頭驛八十里，東去魚泉驛四十里。同前奉勅移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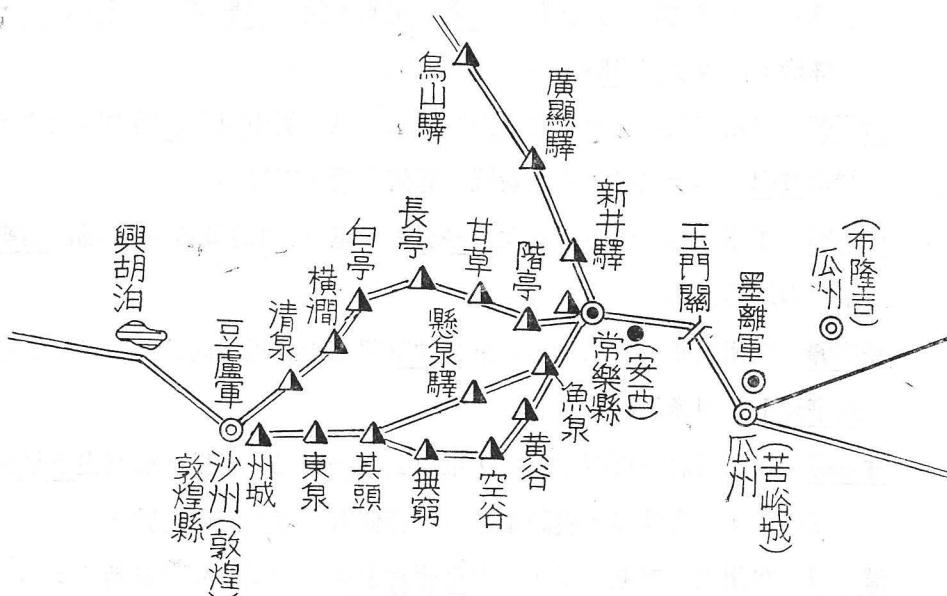
魚泉驛 唐咸亨四年，刺史李祖陁（隆）奏奉勅置。去州東一百八十五里，東去瓜州常樂驛四十五里，西去懸泉驛四十里。同前奏〔奉〕勅移廢。

无窮驛 在州東一百里，在无窮山置。西去其頭驛三十五里，東去空谷驛三十里。唐永淳二年奏移就北行，其驛遂廢。

空谷驛 去州東一百三十里，在空谷山南置，西去无窮驛三十里，東去黃谷驛四十里。爲同前移道，其驛遂廢。

黃谷驛 去州東一百七十里，東去魚泉驛二十五里。爲同前移道，其驛遂廢。

據此可作簡圖如次：



據此段史料，高宗永淳二年以前，道由常樂縣驛西南行，經魚泉、黃谷、空谷、無窮、其頭、東泉六驛至沙州城東之州城驛。是年廢黃谷、空谷、無窮三驛，而於山北置懸泉驛，由魚泉驛西經懸泉驛直取其頭驛、東泉驛至沙州城。至武后天授二年又以南道山險，改從北道，由常樂縣驛西經階亭、甘草、長亭、白亭、橫澗、清泉六驛至沙州城，北道多因烽戍置驛，南道諸驛遂廢。

此諸驛中，惟懸泉驛地方情形可更一步考述。沙州圖經有懸泉水條，云「在州東一百三十里，出於石崖腹中，其泉旁出細流一里許即絕，……三軍人多皆足，人少不盈。側出懸崖，故曰懸泉。」寰宇記一五三沙州敦煌縣目亦云：「懸泉水，一名神泉，在州東一百三十里，出龍勒山腹。……今有祠甚嚴，郡侯

歲謁。」則驛在泉東十五里，因泉受名。復考敦煌掇瑣七一常樂副使田宗員啓云：

「把瓜州大道取向東去，從後奔趣，至橫堆東大檼地突處，亦見牛蹤。不過其兵馬多分取懸泉奔逐……。其賊向東到懸泉城下……。」

是懸泉尚有城。又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有「懸泉學仕郎」，是必寺名。則其地置驛築城，且有佛寺、神祠，其爲南道要地可知矣。

沙州城內有豆盧軍，管兵四千五百人。

元和志四〇沙州目，「豆盧軍，神龍元年置，在州城內。」又涼州目，述河西節度使統軍，有豆盧軍，「沙州城內，以當匈奴要路，山川廻濶，神龍初，置立豆盧軍以鎮之。管兵四千五百人，馬四百匹。」通典「五百」作「三百」。瓜沙兩州各有道通伊州（今哈密）。沙伊道曰稍竿道；瓜伊道曰第五道，一曰莫賀延磧道。高宗、武后時代，此東西兩道曾交替使用。第五道者，由瓜州常樂縣驛西北行二十七里二百步至新井驛，又一百五十一里，中經廣顯驛至烏山驛，又北六十九里二百六十步至雙泉驛，又六十四里八十步至第五驛，蓋即第五烽建置。又北入莫賀延磧，六十八里三十步至冷泉驛，又八十四里至胡桐驛，又八十里至赤崖驛，在伊州柔遠縣西南境，相近有赤崖戍。又西北經兩驛二百四十餘里至伊州治所伊吾縣（今哈密縣），去瓜州九百里。明清大道及今日汽車火車道大抵即循此古道而行也。稍竿道者，由沙州城驛西北行，一百一十里至興胡泊，又一百三十二里至河倉城（今大方盤城），又三十里至玉門故關城（今小方盤城），又折北行蓋六十六里至鹹泉戍，爲沙伊兩州分界處。又北至稍竿館，置稍竿戍。又北至伊州治所伊吾縣，去沙州七百里。

欲考此道，先當明伊州所在。顧氏紀要六五哈密衛目云，伊吾廢縣即今衛治。是謂唐之伊州在今哈密也。此殆明人通說。西域圖志九，雖仍舊說；然有所疑。其哈喇和屯條云：

「按唐伊州伊吾縣故城基址，史無明文。以元和志、新唐書，伊吾縣南有陸鹽池及鹽池海之說推之，是當時縣治在鹽池北也。若以今哈密城鎮西府城當之，則鹽池在城東北，不在城南，而今哈喇和屯則適居鹽池之北，疑屬唐時伊吾縣故城也。蓋歷代置立州縣治所，不必一處，疑漢伊吾舊城、隋伊吾新

城皆在今哈密，至唐景龍四年於伊州西北三百里置伊吾軍，乃移縣治於此，今之哈喇和屯，殆即其遺址，故南有鹽池，形勢相合耳。」

一統志哈密卷從其說。按清哈喇和屯在鎮西東稍北三百二十里、天山之北，當在哈密之北二百里以上。唐之伊州南至沙州七百里，東南至瓜州九百里，西至西州七百五十里以上至九百里，指為哈密地區，最為適當。且慈恩法師傳云，行莫賀延磧中，忽得青草水池，「更經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則行盡流沙，即到伊吾，不云越大山始至。且唐世瓜沙至西州之交通主道既經伊州，西州在天山之南，驛道無緣先越天山峻嶺，至山北，旋又折入山南也。圖志作者徒執唐代志書鹽池之說以立論，不知西北沙磧地區，山脈無變化，池澤則可隨時變移，況今哈密城南有南湖，西域圖志二四：「南湖在哈密城南二十里，賽巴什湖東來入之，又匯南山口以西諸泉，折而西流二百里，為沙磧所限。」安知非即唐代陸鹽池耶？論西北地理總當通觀形勢，執一水一湖以證古地，往往失之。

伊州地望已明，茲考瓜沙通伊州之驛道。按此驛道明見沙州都督府圖經云：

新井驛 廣顯驛 烏山驛 已上驛，瓜州捉。在州（沙州）東北二百二十七里二百步，瓜州常樂縣界。同前奉勅置。（望接謂天授二年五月十八日勅。）遣沙州百姓越界供奉。如意元年四月三日勅移就稍竿道行。至證聖元年（即天冊萬歲元年）正月十四日勅為沙州遭賊少草，運轉極難，稍竿道停，改於第五道來往。又奉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勅，第五道中總置十驛，擬供客使等食，付王孝傑并瓜州沙州審更檢閱。令瓜州捉三驛，沙州捉四驛。件檢瓜州驛數如前。

雙泉驛 在州東北四百七十七（按當作四十七）里一百六十步，瓜州常樂縣界。唐儀鳳三年閏十月奉勅，移稍竿道就第五道莫賀延磧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奉如意元年四月三日勅，移就稍竿道行。至證聖元年正月十四日勅，為沙州遭賊，改第五道來往。南去瓜州常樂縣界烏山驛六十九里二百六十步，北去第五驛六十（脫四？）里八十步。

第五驛 在州東北五百一十一里四十步。同前奉勅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

去雙泉驛六十四里八十步，北去冷泉驛六十八里三十步。

冷泉驛 在州東北五百七十九里一百七十步。同前奉勅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第五驛六十八里三十步，北去胡桐驛八十四里。

胡桐驛 在州東北六百六十三里一百七十步。同前奉勅置。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冷泉驛八十四里，北去伊州柔遠縣界赤崖驛八十里。」

據此一段詳細史料，可識數事：(1)以上七驛皆在瓜州境內，爲由南向北至伊州柔遠縣境之驛道。第一條所列新井、廣顯、烏山三驛由瓜州捉；雙泉至胡桐四驛由沙州百姓越界捉。(2)所云去州方位里數皆就去沙州言。雙泉驛在沙州東北「四百七十七里一百六十步」，校以第五驛至雙泉里數，此「七十」當爲，「四十」之誤，即雙泉實在沙州東北四百四十七里。(3)雙泉驛南至烏山驛六十九里二百六十步，則烏山驛當在沙州東北三百七十八里。第一條所謂「州東北二百二十七里二百步」者，係就第一驛新井驛而言，則烏山南至新井當爲一百五十一里，廣顯驛居其間。(4)圖經之文先述沙州東至常樂諸驛，起清泉至階亭，「階亭在州東一百七十里，東去瓜州常樂驛三十里。」下即接列新井三驛，云新井在州東北二百二十七里二百步，即在常樂之北二十七里二百步。綜合上列四點觀之，即由常樂縣驛北行二十七里二百步至新井驛，又北一百五十一里，中經廣顯驛至烏山驛，又北六十九里二百六十步雙泉驛，又北六十四里八十步至第五驛，又北六十八里三十步至冷泉驛，又北八十四里至胡桐驛，又北八十里至伊州柔遠縣境之赤崖驛。此即所謂第五道也。

又據新井驛、雙泉驛兩條記事，儀鳳三年（西元678）閏十月勅移稍竿道就第五道莫賀延磧置驛。如意元年（西元692）四月三日勅仍移就稍竿道行。證聖元年（即天冊萬歲元年，西元695）正月十四日勅又改由第五道往來。下文「又奉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勅第五道中總置十驛」者，此「今年」當即次年之萬歲通天元年（西元696），蓋是年三月王孝傑已免官，數月敗沒。（參看舊九三本傳及通鑑二〇五）是在高宗武后時代，時取稍竿道，時取第五驛莫賀延磧道。今分論此兩道如下：

先論第五道。元和志四〇，伊州目，「東南取莫賀延磧路至瓜州九百里。」（

寰宇記，瓜州西北至伊州九十里。十爲百之譏。）當卽指沙州圖經之第五道經莫賀延磧之通道而言，亦卽上文所引由常樂北至柔遠縣境之驛道也。復考慈恩三藏法師傳述貞觀三〔元〕年，玄奘西行云：

「遂至瓜州。…因訪西路，或有報云，從此北行五十餘里，有瓠瀉河，…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關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無水草，五烽之外，卽莫賀延磧，伊吾國境。聞之愁憤。…有一胡人…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於是裝束與少胡夜發，三更許到河，遙見玉門關，…旣渡而喜，因解駕停憇。…天欲明，…欲發，胡人曰，弟子將前途險遠，又無水草，唯五烽下有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卽是死人，不如歸還。…法師知其意，遂任還。…因是孑然孤遊沙漠矣。惟望骨聚馬糞等漸進，…逕八十餘里見第一烽。…夜到第四烽，…烽官相問，答欲往天竺，…第一烽王祥校尉故遭相遇。彼聞歡喜…云，師不須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異圖。可於此去百里許有野馬泉，更取水。從此已去，卽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更經兩日（狀作三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註四）。據此，唐初瓜州至伊吾已取莫賀延磧道，磧南就有水處置五烽，防守甚嚴，五烽相去或八十里或近百里，其第五烽去瓜州蓋四百餘里，幾五百里。核之沙州圖經所記里數，第五驛南至常樂縣三百一十一里，卽至瓜州四百二十六里，里數頗相當，疑第五驛卽唐初之第五烽也。（註五）然則玄奘所行亦卽略循沙州圖經之第五道也。

圖經所記第五道旣卽玄奘所行與元和志所記之瓜州至伊州道，今再推求「總置十驛」中除瓜州境七驛（卽上文所述瓜州所捉三驛，沙州百姓越境所捉四驛）外之各驛所在，亦卽此道北段之路線。

此道北段之路線有兩種可能。或經柔遠縣城，或不經縣城。茲續論之如次：

註四：玄奘此段行程參看斯坦因玄奘沙州伊州間之行程，刊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

註五：岑仲勉先生以慈恩傳之五烽釋魏略之五船，見中外史地考證所收歷代西疆路程簡疏頁六九四，蓋誤新舊玉門關爲一耳。

首先所已知者，柔遠縣境之赤崖驛必爲十驛之一。赤崖南去常樂縣五百四十三里，即南去瓜州六百五十八里。據元和志及寰宇記，皆云柔遠縣在伊州東南二百四十里。在州東南，頗有爲此大道所經之可能。前述瓜州至伊州取莫賀延磧路九百里，則赤崖驛至柔遠縣城僅二里，似即爲縣城驛，然圖經云驛在「縣界」，且大道自常樂北行凡七驛至胡桐，剛入柔遠縣界即抵縣城，亦絕不合理。明赤崖驛絕非柔遠縣驛。所謂九百里者可作大數解，則赤崖當爲柔遠縣南之一驛，北去柔遠縣城當有三五十里。另外兩驛自當解釋爲在柔遠西北至伊州二百四十里之道上矣。然此種解釋本身有一大弱點，即柔遠縣城必亦置驛而不計算在內。且唐光啓元年書寫之沙州伊州地志殘卷（據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所錄）之伊州篇云：

「伊吾縣在郭下。…（有）戍三：□亭、赤崖、稍竿。」

「柔遠縣，西南去州二百四十里。」

是柔遠縣在伊州東北，與元和志、寰宇記作東南者不同。此已使大道經柔遠縣城之說發生問題，但尚不能斷。最足使道經柔遠城之說發生問題者，乃因伊吾縣有赤崖戍。赤崖地名之範圍不會太大，前引沙州圖經，有赤崖驛在柔遠境界，而此沙州伊州地志，有赤崖戍在伊吾縣境。戍驛同名，縱非一地，亦必相去不遠，而分屬兩縣，（或即在一地，而屬所之縣因時而異。）而縣治又相去二百四十里之遙，則赤崖地名決不在柔遠縣南三五十里，而當在柔遠西南，伊吾東南皆甚遠。是大道當不經柔遠縣城，而由赤崖向西北直趨伊吾，中間二百四十餘里，置二驛。就赤崖、胡桐、冷泉三驛間之距離八十里、八十四里觀之，赤崖至伊吾中間置二驛，正各相去八十里也。故此道不經柔遠縣城之可能性爲大。

次論稍竿道。據此圖經所記，唐代前期，稍竿道與第五道交替使用，兩道對舉，第五道既在沙州之東北，爲東道，則稍竿道當爲西道。考寰宇記一五三伊州目云：

「（伊州）正北（南之譌）微東取稍竿館路至沙州七百里。」

按元和志四〇，伊州「正南微東至沙州七百里。」寰宇記「北」爲「南」之誤

無疑。「稍竿」自卽「稍竿」之異寫，是所謂「稍竿道」者，卽取道稍竿館也。前引光啓元年所書寫之沙州伊州地志殘卷，伊吾縣所屬有稍竿戍、赤崖戍。赤崖戍既在縣之東南，與柔遠縣接境，則稍竿戍當在赤崖戍之西，正當稍竿館路所行地區。置戍卽所以保衛此通道耳。

復考通典一七四，沙州「北至故鹹泉戍三百三十六里，與伊吾郡分界。」寰宇記一五三，全同。此戍當在道上，南去沙州，北去伊州里程略均。

又考沙州都督府圖經云：

興胡泊，東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鹹苦，唯泉堪食。商胡從玉門關道往還居止，因以爲號。」

羽田亨云，「興胡」卽「商胡」。（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興胡名義考。）據此條，商胡來往經此泊及玉門故關。元和志，沙州壽昌縣「東至州一百五里。」志又云：

「玉門故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謂之北道，西趣車師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門戶也。」

寰宇記云壽昌縣在州之西南一百五十里。元和志奪「十」字。按玉關故城西北直通西州之道（卽漢世敦煌趣車師前庭之新道。）唐世雖尚存，然無井泉水草，沙磧難行，商旅往來絕少，（詳後文。）此云「商胡從玉門關道往還」，蓋仍取伊州道，卽稍竿道也。故可斷興胡泊及玉門故關皆在此道上。玉關故城，道光敦煌縣志以爲在敦煌西北之小方盤城，斯坦因所指認之遺址在敦煌西九十四度以西者，亦卽其地。辛卯侍行記以今大方盤城當之，非也。勞文已有詳細論證，可無疑矣。小方盤城高踞原頭，二三十里外即可望見，正當爲置關之所。

復考沙州都督府圖經云：

「阿倉城周廻一百八十步，在州西北二百四十二里，俗號阿倉城，莫知時代，其城頽毀，其址猶存。」

又倫敦藏石室本 S.5448 敦煌錄亦云：

「河倉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時軍儲在彼。」（此條轉引自向達兩關雜考。）

檢通典一七四，沙州「西北到河倉烽二百四十二里。與廢壽昌縣分界。」寰宇

記作阿蒼烽。蓋皆卽一地，因城置烽耳。向氏兩關雜考云，「河倉城，以今地考之，卽在古玉門關故址之小方盤城東四十里，俗名爲大方盤城者是也。」又云，民國三十二年曾出石碣，云泰始十一年造，卽造此城也。勞文云大方盤在小方盤之東三十里，今去大道不遠。所出漢簡大半有關廩給，故亦疑爲一倉庫。殆卽此河倉城也。蓋古道卽自沙州西北行一百十一里，至興胡泊，又一百三十二里至河倉城，又三四十里至玉門故關，然後北至鹹泉也。

伊州之北時羅漫山（天山）有貞觀十四年姜行本所立記功碑，在今哈密東北五十里天山上。第以天山高處，故立碑於此，實非大道所經也。

姜行本記功碑（金石萃編四五）以貞觀十四年六月立。有云：

「以通川公（行本封通川縣男）深謀間出，妙思縱橫，命□前軍，營造攻具，乃…率驍雄鼓行而進，以貞觀十四年五月十日師次伊吾時羅漫山，北登黑紺所（？）未盈旬日，尅成奇功，伐木則山林殫盡，叱咤則川谷蕩薄，衝梯矗□，百□冰□，機搶一發，千石雲飛，墨翟之拒無施，公輸之妙詎比。」

按此，似是過時羅漫山者。考舊五九姜行本傳云：「及高昌之役，以行本爲行軍副總管，率衆先出伊州，未至柳谷百餘里，依山造攻具。其處有班超記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而去。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是則釋爲道經此山固可，但亦可認爲只依山造攻具，非必當道也。檢統志哈密卷山川目，庫舍圖嶺在哈密東北五十里。庫舍圖，譯言碑也。嶺以碑名，上有唐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文。雍正十一年，將軍查郎阿開南山運道，經數十折達於山頂。又王昶跋尾引乾隆間錢塘施養浩出塞存稿邊碑詩自注云：「雍正九年，大將軍查郎阿以（巴里坤）南山達坂陡峻，不能運車糧，乃相度山形，開鑿以通之，山巔得唐碑，係貞觀十四年伐高昌，左屯衛將軍姜行本勒石紀文碑。」又西北叢編卷四，鎮西縣勝蹟條，雍正七年，岳鍾琪在鎮西城東五十里獲漢裴岑紀功碑。又城東七十里爲奎蘇，又東八十里爲松樹塘，塘東南十餘里，俗稱天山頂，卽唐姜行本碑所在。是則唐碑在今鎮西縣東偏南一百六十餘里，哈密縣東北五十里之天山巔。授堂金石跋云「碑今在哈密城北天山之麓，土人名濶石圖，漢言碑嶺也。」方位是，而云「山麓」似非也。蓋姜行本兵至伊州，屯駐之，

因採時羅漫山之木材造攻具，遂立碑於山巔，非必行經此山巔也。

伊州西至西州有南北兩道。北道由伊州直西行經益都一百二十里至納職縣（今 Lap-chuk. 卽四堡）。又西經獨泉、東華、西華、駝泉，渡茨莫水，過神泉，三百九十里至羅護鎮守捉城（今納呼），又西南經達匪、草堆，一百九十里至赤亭鎮守捉城（今七克騰木）。納職縣西有大患鬼魅磧，道行磧中三日約二三百里至鬼谷口，地有風險，故置驛以避風名，其地望當在羅護以東，（今十三間房東南。）所謂柳谷者亦當在此段道中。南道稱爲伊西道，行納職縣南，至赤亭鎮，與北道合，行程不詳。大抵北道行今順納湖(Sho Na Nur)之北，路線略與今鐵道線相同而稍南；南道則行順納湖之南也。兩道既會於赤亭，故稱道口，爲要衝。赤亭西行約九十里至白力城（今鄯善縣），又約四十里至柳中縣，古田地城（今魯克沁），縣置驛。又西約四十里上下至西州治所高昌縣。（今吐魯番東七十里之阿斯拉，即二堡；或阿斯拉西十餘里之哈喇和卓，即三堡。）

新唐志伊州納職縣條云：

「自縣西經獨泉、東華、西華、駝泉，渡茨莫水（註六），過神泉，三百九十里有羅護守捉，又西南經達匪、草堆，百九十里至赤亭守捉，與伊西路合。別自羅護守捉西北上乏驢嶺百二十里至赤谷，又出谷口，經長泉、龍泉，百八十里有獨山守捉，又經蒲類百六十里至北庭都護府。」

此所記伊州至西州道甚詳。據此文，兩州間之交通線似有兩道，一爲伊西道，一卽此條所詳記之道也。觀「別自羅護守捉西北上乏驢嶺」至北庭云云，知此所詳記自納職出發之道，乃北道，所謂伊西道乃南道，兩道至赤亭會合也。

復考宋史四九〇外國傳六高昌國傳引王延德使高昌記曰：

「次歷洩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勅尚在。……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

註六：按魏書一〇一高昌傳，太和二十二年，高昌王馬儒欲舉國內徙，帝使韓安保自伊吾迎之，至羊棗水。儒遣使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北史西域傳同。疑此羊棗水卽茨莫水歟？

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風驛，用本國法設祭，出詔神禦風，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地名寶莊，又歷六種，乃至高昌，高昌即西州也。」

按延德以太平興國六年出使，八年回程，雍熙元年至京師，則上距五代僅二十年。所行當即唐五代時期之故道，所謂避風驛者或即唐代故驛。又此行程亦經納職，殆取新志所詳記之北道；「南望玉門關甚近」者，蓋臆測之辭耳。

此外唐代初年尚有兩項記載。其一，慧立慈恩法師傳云：

「出流沙，到伊吾。……法師意欲取可汗浮圖過；既爲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南磧，經六日至高昌界白力城。時日已暮，法師欲停。…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換良馬前去，…即以其夜半到王城。」

按此云「行南磧」，似指南道而言，然觀此文與可汗浮圖城道對舉，則只能斷定玄奘係行天山之南，至於取南道抑北道，固不能斷。所可知者，去伊州六日程接近高昌國處，有白力城。其二，通鑑一九五貞觀十四年紀，述侯君集伐高昌事云：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臨磧口，憂慮不知所爲，發疾卒。…軍至柳谷，鼓行而進，至田城（考異曰，實錄作田地城，今從舊傳。今按舊六九侯君集傳及一九八高昌傳皆作田地城，是也。）…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夜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

據前引舊五九姜行本傳，柳谷當在伊州西百里以上，當大道。胡注引新志，「西州交河縣北行二百一十里至柳谷渡。」爲說，誤也。按伊西地區蓋多柳，故西州之東有柳谷縣，交河之北有柳谷渡，元和志柔達縣有柳谷水，不可執一而說也。然道經谷地，似當行天山南麓，即前述南北兩道之北道，亦即似行新志所詳記之道也。又據此文，知近高昌都城處有田地城，人口頗多。

由上言之，伊州西至西州有南北兩道。北道經益都至納職縣，又西經獨泉、東華、西華、駝泉，渡茨莫水，過神泉，至羅護守捉城，又西南經達匪、草堆至赤亭守捉城，東去納職縣五百八十里。納職在大患鬼魅磧之東，由此西行三日約二三百里至鬼谷口，蓋即鬼魅磧口。地有風險，故置驛，以避風名，觀其

日程，當在赤亭以東。南道稱爲伊西道，行程不詳；所可知者，行納職之南，至赤亭與北道合。通鑑所記之柳谷，當在納職至赤亭間。至其所記田城（當作田地城）及慈恩傳所記之白力城，王延德所記之澤田寺、寶莊、六種，皆當在赤亭以西道上也。今就以上地名之別可推證者續考如次：

納職縣 元和志四〇伊州，「納職縣東北至州百二十里。」寰宇記一五三，方向里數同。近代中外學人皆以爲即 Tapchuk，亦即今圖之四堡。按西域圖志九，「拉布楚喀亦名五堡（觀前後次序，此五爲四之譌）……東距哈密城一百四十里，境有村莊凡十三，一泉九處，小河一道。」此即 Lapchuk。誠與納職之音爲近。檢明永樂間陳誠西域行程記云：

「十五日早起，由哈密城東門外渡溪水向西行，皆平川，約行七十餘里，有人烟好水草處安營。十六日晴明，起向西行，有古城名臘竺，多人烟樹木，敗寺頽垣。此處氣候與中原相似。過城通行九十餘里，好水草安營。」（此條李仲勉前輩曾引用。）

就方向里距而言，近代之拉布楚喀 Lapchuk 卽臘竺之遺音無疑，而臘竺又即唐宋時代納職之音寫，亦無疑也。觀其氣候及人烟樹木敗寺頽垣之狀況，尤可徵信。至於此地在哈密正西，而唐宋志書云伊州西南，只是小小差異耳。且柔遠縣本在伊州東北，而唐宋志書云州之東南，此等處不可泥。又按納職縣既在今之四堡，據國防研究院地圖，四堡在順納湖（Shona Nur）之北，則北道當行湖之北，南道當行湖之南矣。

避風驛 據王延昌記，由納職三日行，至此，地有大風，當在納職西二三百里處。考清咸豐間楊炳堃西行記程二，哈密至烏魯木齊（迪化）有兩道，大道由哈密北經鎮西，使車多由之。又有小南路，自哈密至白山子與大北道合。小道可避天山撻坂之險，貨運較易，故商販均取小南路。小南路經十三間房，有風險。又西北叢編卷三民國八年四月十九日條，由哈密西行二百六十八里至瞭墩，此處西去吐魯番有兩道，南道經胡桐窩至十三間房，凡二百八十里。「以十三間房屢有怪風，今無行之者。」（下述左文襄西征時，一陣大風造成之慘案甚詳。）其地東去哈密五百四十八里。（行順那湖之北，）西至齊克塔木一百三十里。又

九十里至鄯善縣，又二百一十里至吐魯番，即十三間房西去吐魯番四百三十里。檢國防研究院地圖，十三間房約居哈密與吐魯番之正中間，在鐵道上。就形勢論，此正當唐之伊州通西州道上，疑避風驛即約當今十三間房東南地區。又按四堡在今鐵道之南。十三間房之南有唐朝墩，可能亦爲唐代遺址之一。疑唐道行今鐵道之南也。

白力城 據慈恩傳所記，此城當在高昌城東不算太遠。考魏書四三唐和傳，和兄契爲伊吾王，「爲蠕蠕所逼，遂擁部落至於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率騎討和，至白力城。和率騎五百先攻高昌，契與阿若戰歿。」下文又云和復攻高寧、白力二城。通鑑一二四，繫此事於宋元嘉十九年，而文稍略。胡注：「李延壽曰，高昌國有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白刃、橫截等，餘不具載。白力當作白刃。」按南史七九西域高昌傳，「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寧由、始昌、篤進、白刃等。」胡注當據此而言。檢梁書五四西域高昌國傳，與南史同，惟寧由作由寧，白刃作白刀。又考魏書一〇一高昌傳，太和二十一年，高昌王馬儒請內徙，高祖遣韓安保率千騎赴之，及過伊吾，儒遣長史顧禮「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按此白棘城與唐和傳、慈恩傳之白力城地望頗相當，蓋卽一音而異寫耳。南史作白刃、梁書作白刀，皆白力之形譌，非「力」譌也。胡注誤。其地，馮承鈞以爲在今關展，即鄯善，蓋略近之。

田地城 初學記八隨右道目引地輿志曰：「晉咸和二年置高昌郡，立田地縣。」則田地之名極早。前引李延壽說，田地城爲高昌四十六鎮之一，是也。侯君集以日午克田地城，遂夜襲高昌都城，其去高昌自亦不遠。通鑑一九一邊防高昌傳，魏太和末，麴嘉爲王，「國內有城十八，置四十六鎮。官有令尹，有交河公，田地公，皆其王子也。」貞觀十四年，滅高昌，「以交河城爲交河縣……田北城爲柳中縣。」田北卽田地之譌。檢元和志四〇，西州有柳中縣，「西至州三十里。貞觀十四年置，當驛路程，極險固。」則田地城卽柳中縣，在西州東三十里也。寰宇記一五六，柳中縣在州東四十四里。里距小異。黃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國學季刊三卷一期）云，王延德所記六種乃柳中之對音。未知確否？

西域圖志十四關展條：「今魯克察克爲唐柳中縣，在關展西七十里。」又魯克察克條，云：「按今魯克察克，本漢柳中地，戍已校尉城此，因名柳城，後訛爲柳陳，轉爲魯陳，復轉爲魯克塵。肅州新志作魯谷慶，一名魯普秦，後名魯克沁，要不外音之相襲成訛也。」黃文弼似未檢此條，但亦以魯克沁當之。其言曰，疆民讀『克』均爲語助詞，有音無字，『沁』則讀如『慶』，即城也，如吐魯番城曰吐魯番沁爾是也。馮承鈞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中央亞細亞創刊號）亦云田地城非魯克沁莫屬。今檢國防研究院地圖，鄯善（即關展）至吐魯番間有魯克沁地名。

赤亭守捉城 據前文所考，赤亭爲伊州西行之南北兩道會合處，自爲要地，故置守捉。復考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書の研究（京都東方學報第三十三冊）引寧樂美術館所藏文書有赤亭、赤亭鎮之名，（又有赤京鎮疑亦赤亭鎮之誤釋。）即其地，且置鎮也。敦煌石室佚書本西州志殘卷記州境十一道，首爲赤亭道，惜下文殘闕，（註七）當即指西州通伊州之道也。以其當兩道之會口，爲西行道中之要衝，故岑參詩篇屢詠及之。如：

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云：「曾到交河城，風土斷人腸，塞（紀事作塞）驛遠如點，邊烽互相望，赤亭多飈風，鼓怒不可當。」（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一，唐詩紀事二三）

天山雪歌送蕭沼歸京云：「北風夜捲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同上，參集二，紀事同上）

火山雲歌送別云：「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雲厚。」（全唐詩同上）

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云：「火山六月應更熱，赤亭道口行人絕。」（全唐詩同上。）

按此四詩，三稱道口，兩涉多風，即爲今考之赤亭鎮守捉無疑。其地當在今鄯善縣以東。中外學人，皆以爲即今日齊克塔木，一作七克騰木之本音。此說創始於辛卯侍行記，岑仲勉先生又申其說，並引陳誠西域行程記，明初七克騰地

註七：據日比野丈夫同上文及馮承鈞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所引，余所用鳴沙石室佚書本西州志經缺此道及新開道。

尙名赤亭也。見其所著吐魯番一帶漢回地名對音（史語所集刊十二本）。按七克騰木，侍行記云在關展東九十里。西北叢編三，齊克塔木一作七克騰木，在鄯善縣東九十里，十三間房西一百三十里，殆即國防研究院地圖之南湖地區歟？

羅護、達匪 日比野丈夫唐代蒲昌府文書の研究引寧樂美術館所藏文書有羅護、羅護烽及達匪等地名，即此新志所記者無疑。日野云：「斯丹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漢文文書第二七五號及大谷探檢隊所獲文書第三三四四號，有羅護鎮。安部健夫以爲即今之納呼。」檢西域圖志一四，納呼「西距關展城（今鄯善縣）二百一十里。四圍皆山，濱湖之地可駐牧。其西谷口狹而深，爲關展東境關隘。」又云：「齊克塔木在納呼西一百四十里，東距關展城七十里，（實在關展東七十里。）自納呼西入谷口，山徑崎嶇，自高而下，七十里就平地，又七十里至齊克塔木。」就字音里距及形勢言，羅護鎮守捉固當即今之納呼也。其地有湖，似即國防研究院圖之南湖。然就上引西北叢編所記之里距言，南湖當爲齊克塔木，納呼當爲其東一百三十里之十三間房也。又考初學記八隸右道目引十三州志：「高昌壁……有長谷在東。」今按吐魯番以東皆平地，至齊克塔木與納呼間始有此峽谷，殆即十三州志所謂長谷也。達匪居羅護、赤亭之間，蓋即當此谷之東西耳。

西州高昌縣 西域圖志一四，哈喇和卓，「在洋赫西北三十里，東北距關展城二百六十里。地方三百里，舊城已廢，……唐交河郡高昌縣治也。」馮承鈞譯伯希和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收入史地叢考）云：「紀元初時，車師前部中又有高昌壁，爲漢兵屯住之所，應爲後之哈喇和卓。當紀元四六年時，闕伯周始稱高昌王（見北史），顧名思義，其都城應爲漢之高昌壁也。近日格林維對耳（Grunwedel）在哈喇和卓附近之雅圖庫城（Ydygut, Sahri）所發現五世紀之古碑，自經弗蘭克（Franke）譯出之後，前說遂以證實。…六四〇年，唐兵所取之高昌都城亦在哈喇和卓。……九八一年王延德使高昌，即其地也。」是與西域圖志之說相同。而黃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稱伯氏之說未可信，云詢之土人，舊城在阿斯搭拉，義謂二堡；在今吐魯番東南七十里；哈喇和卓在二堡之

西約十餘里，地名三堡。是黃氏新說在舊說之東十餘里耳。按明史三二九西域傳，「火州（和卓）又名哈喇，……隋時爲高昌國，唐太宗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東有荒城，即高昌國都。」是明人已有高昌故城在哈喇和卓之東之說。又檢西域圖志一四，魯克察克即魯克沁，在關展城西二百十里，哈喇和卓在關展城西二百六十里，若唐柳中縣誠在魯克沁，則據元和志、寰宇記，柳中去高昌三十里或四十四里，則高昌城固應在今哈喇和卓稍東，或者黃說爲更準確歟？

唐宋志書稱伊西間七百三十里或七百五十里，實則南北兩道皆當在九百里上下，不止七百數十里也。

伊西里距，通典作七百五十里，寰宇記同。而元和志作七百三十里。就各書所記，西伊兩州至長安里數之差距言，元和志無自相矛盾處，似當以七百三十里爲正；然實不止此數。

前引新志記納職縣西至赤亭守捉之詳細行程，累計爲五百八十里，加伊州至納職間一百二十里，已爲七百里。此道至赤亭與伊西道合，赤亭以西決不止三五十里，自不待言。若擬赤亭在七克騰木之說不誤，（即非其地，西東相去亦不遠。）據一統志吐魯番卷屬境目，自七克騰木（即齊克塔木）經關展至哈喇和卓二百二十里（下文據西北叢編計算，亦略同此數。）是唐世北道當在九百里之譜。今檢西北叢編卷三述哈密西二百六十八里至瞭墩，瞭墩西南經十三間房至七克騰木四百一十里，瞭墩正西行經一碗泉、七箇井，折而西南亦至七克騰木，凡四百四十九里，七克騰木經關展至吐魯番二百九十八里，則七克騰木至哈喇和卓亦二百二三十里，故叢編所記兩道或近九百里或九百二三十里也。唐代北道與西北叢編所記經十三間房之道，略相當，則古今里數無大差異，皆近九百里也。至於唐之南道里數雖不可考，要與北道相差亦不會太遠，恐亦不止七百五十里也。

而寰宇記釋裴矩所稱伊吾路，以爲由柳中縣東南行經大沙海之東，又東南度磧至伊州界者。蓋不經伊州城歟？若亦至伊州城，則南道之南又一道矣，里程當更糾。

寰宇記一五六西州柳中縣條，有柳中路，引裴矩西域記云，「自高昌東南去瓜

州（即唐之沙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草。…是以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下文，寰宇記編者接云：

「又一路，是縣（柳中縣）東南行經大海之東，又東南度磧，入伊州界，即裴矩所爲〔謂〕伊吾路也。」

按大海即後文考大海道時所論之大沙海，在柳中縣東南九十里。不知裴矩所謂伊吾路者，果如寰宇記所釋歟？若所釋不誤，是此伊吾道由柳中縣東南行，經大沙海之東，又東南度磧，所謂「入伊州界」者，豈僅入州界而不經州城歟？此道方向，決不經赤亭，若此道亦至伊州城，則必南道之南又一道矣，至少西段爲另一道。

高宗永徽二年再置安西都護府，治高昌縣；顯慶三年，移治龜茲國。開元二年置天山軍，管兵五千人，在州城內，故以刺史兼軍使，或統屬安西都護、磧西節度使，或統屬北庭節度使。

永徽二年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高昌縣，詳後文安西都護府治龜茲國條。

張九齡敕西州都督張待賓書（全唐文二八七），待賓書銜爲「天山軍使西州刺史。」是西州刺史嘗兼天山軍使也。檢元和志四〇，西州，「天山軍在州城內，開元二年置。」又庭州目，置北庭節度使，所管有天山軍（在）西州城內，開元二年置，管兵五千人，馬五百匹，在理南（庭州之南）五百里。」按庭州至西州正爲五百里。是西州天山軍統屬於北庭也。然六典五兵部卷，磧西節度使所統除安西、疎勒、于闐、焉耆四鎮外，又統西州鎮守使。是西州天山軍者亦如四鎮之比，統屬於安西都護府磧西節度使也。蓋亦因時而異所統屬。

西州高昌縣向西微南行，經南平城（今雅爾湖東南七十里？）、安昌城（今雅爾湖南三十里？）一百五十里至天山縣（今大墩子或托克遜）。又由高昌縣向西微北行八十里至交河縣（明代堇兒城，今吐魯番西二十里之雅爾），本古交河城，貞觀十四年平高昌時，曾置安西都護府於此。由此復折而西南行約百餘里亦至天山縣。古篤進城在此地區。再由天山縣西南行七十里至天山山麓（今蘇巴什山），西南入谷，經礪石磧、阿父師泉（今阿海泉）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庫木什山），有磧西館，又四十里至呂光館，又經盤石（今額格爾齊山中）百里至張三城守捉（清烏沙克塔勒，蓋今榆樹溝），又西南經新城館渡淡河（蓋今塔哈）

唐代涼州西通安西道驛程考

甚、塔未毫西之河流），一百四十五里至焉耆鎮城（今焉耆縣），即焉耆國所都。城極大，在海水（今博斯騰海）之北，大河（今海都河）東岸，衆流交帶，羣山外繞，極為險固，為安西四鎮之一。

焉耆古國，太宗貞觀十八年，以其貳於突厥，詔郭孝恪伐而降之，為屬國，仍置兵鎮守，為盛唐時代安西四鎮之一。詳後文。

西州圖經（羅氏鳴沙石室佚書所收）所記西州通道之殘存者，有銀山道，云：

「右道出天山縣界，西南向焉耆國七百里，多沙磧滷，唯近烽足水草，通車馬行。」

此由西州通焉耆之道，行程七百里也。新唐書地志西州目，記此道較詳云：

「自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二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經礪石磧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呂光館，又經盤石百里有張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經新城館，渡淡河至焉耆鎮城。」

按通典一七四西州交河郡，「西至焉耆鎮守軍七百一十里」「西南到焉耆七百一十里。」元和志四〇，西州，「西南至焉耆七百二十里。」寰宇記一五六，西州目，與通典同。（註八）大約此道七百里有餘，西州圖經舉大數言之。新志所記里程總和只六百二十五里，當有脫誤，無疑。俟後文續證再論之。

新志所述既詳如此，前人解釋此道行程，似以西域圖志為最早，近人亦無能異之者，茲先詳錄圖志之說如次：

西域圖志二三，蘇巴什塔克條云：

「蘇巴什塔克（塔克，山也）……自博羅圖（蓋即今天格爾山 Tiengar）納林奇喇諸塔克迤邐東屬，經闢展南境，踰東界而止，為闢展南屏。……其北谷口在托克三（即托克遜）西南五十里，谷內有兩大石，入谷行十里，微有水草，蓋古車師通焉耆道也。……唐地理志稱西州西南入谷者，當指蘇巴什山谷而言，谷內兩大石，意即所謂礪石也。又按自托克三西出有三道：其一出伊拉里克，由阿拉癸鄂拉入谷口，經裕勒都斯，以抵伊犁。其一，經納林奇

註八：寰宇記一八一，焉耆國「東去交河城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蓋舊日計程。

喇山口，踰博羅圖谷口，迤南以抵楚輝。其一，西南入蘇巴什山口，踰庫木什阿克瑪塔克，亦抵楚輝。」（按楚輝在哈喇沙爾城東一百二十五里。）

又庫木什阿克瑪塔克條云：

「庫木什阿克瑪塔克在蘇巴什塔克北谷口西南一百四十里。自蘇巴什北谷迤邐西南行十里，漸聞水聲，遍谷皆淺水，山勢漸狹，兩厓壁立，人行其間如一線天。又里許即沙灘。又二十里有大石崎嶇者二處，車不能行，爲古車師西境關隘。又二十里至艾噶爾布拉克（布拉克，泉也。）又五十里出南谷口。山脈自蘇巴什塔克分支西南行至此。按回語，庫木什，銀也；即唐書所謂銀山磧也。」

又額格爾齊塔克條云：

「額格爾齊塔克在庫木什阿克瑪塔克西南一百三十里，自庫木什阿克瑪塔克東口西行四十里入南山之北口，折而東南，又迤邐西南行三十里出南口，又轉而西行六十里至西山下，玲瓏怪石，徧地葦草，掘之得水。自此西南行入於沙磧。……額格爾齊塔克有奇石，當庫木什阿克瑪西南境，即唐書所云盤石也。」

同書烏沙克塔勒條云：

「烏沙克塔勒（此當即今圖之榆樹溝）在哈喇沙爾城東二百十五里，自闢展西行，入蘇巴什塔克口，又西南行，踰庫木什阿克瑪塔克，額格爾齊塔克，三百四十里至其地。……唐書地理志，經盤石百里有張三城守捉。……烏沙克塔勒之廢城應即所謂張三城者也。」

又哈喇沙爾條云：

「哈喇沙爾……土地肥沃，魚鹽蒲葦之饒，甲於他處。……城北倚大雪山，額格爾齊塔克屏其東南，庫隴勒塔克繞其西南，遙山環拱，所包面積縱橫四五百里，當爲焉耆國全境。後漢書謂四面有大山，（按又云「道險阨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唐書謂橫六百里，縱四百里。西域記謂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四面據山者，是也。山內海都郭勒南趨，會博斯騰淖爾之水，西南出庫隴勒塔克口，東赴羅布淖爾。羅布淖爾爲古蒲昌海，所

謂海水曲入山內者也。〔後漢書西域傳云：「海水曲入四山之內」〕云曲入者，約略之詞。……其實四山內之水流出注海耳。其爲古焉耆無疑也。惟是城廓變遷，今城南去博斯騰淖爾止四里，以魏晝南去海十餘里之文證之，度古員渠城故址猶在今城北十數里，所謂（海）水匝其城三十餘里者，〔見後漢書西域傳。〕形勢宛然。」

按此所釋以焉耆古國城在哈喇沙爾（Kara Shahr）即今焉耆縣，誠爲形勢宛然，殆不可易。然沙畹西突厥史料云：「世人考訂昔之焉耆爲今之哈喇沙爾 Karac-har；然應注意者，今之哈喇沙爾城在海都河 Khaidou 左岸，而唐書及玄奘則位置焉耆城於此河之西。」檢慈恩傳卷二，在阿耆尼國停宿後，始云：「前渡一大河，西履平川行數百里入屈支國界。」是焉耆城實在海都河（即今圖之珠勒都斯河 G. Yuldus）之東。又唐志只云「經新城館，渡淡河，至焉耆鎮城。」淡河未必即海都河。且西域圖志一五，「塔噶爾齊，在楚輝西三十里，踰小河一道，至其地。西距哈喇沙爾城九十五里。」國防研究院圖，焉耆東有塔哈其（Tagharche），塔未憂（Tawigha）兩地名，其處有河水，自北向南流入博斯騰海，塔淡音近，疑此水即古淡河也。是古焉耆城仍當在海都河東岸，非西岸也。

又圖志以庫木什阿克瑪山釋唐志之銀山磧。按銀山，唐代載籍除前引西州圖經及新唐志外仍屢見。如慈恩傳卷二：「西行至阿耆尼國阿父師泉…宿於泉側。明發，又經銀山。山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也。」又舊八三郭孝恪傳，授安西都護、西州刺史。率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伐焉耆。通鑑一九七，貞觀十八年述其事云：「焉耆貳於西突厥……詔以孝恪爲西州道行軍總管，帥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擊之。……執其王突騎支……而還。孝恪去三日，（西突厥大臣）屈利啜引兵救焉耆不及。……以勁騎五千追孝恪至銀山，孝恪還擊破之。」足見此處爲軍道之要。岑參有銀山磧西館詩（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二）云：「銀山磧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是置館尙可考也。就形勢方位與出銀甚豐言之，圖志以庫木什阿克瑪山釋之，亦無可疑。

焉耆城及銀山磧地望，圖志所釋既不誤，則此道大勢即如圖志所釋可知矣。即

唐代行程略如清之驛道，亦即略如今之汽車道也。茲再增釋數地名如次：

南平城、無半城、及安昌城 唐志有南平城及安昌城在西州西南道上。考慈恩傳卷一云：「從是（高昌國）西行，度無半城、篤進城，後入阿耆尼國。」沙晚西突厥史料第一篇第二節路程云，玄奘行程之無半城得爲唐書之南平城。字形相近，頗有可能。黃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曰，「南平安昌二城，新志云在州之西南。余此次由雅爾岩西南行，……發現舊城二，一在雅爾岩南三十里，一在雅爾岩東南七十里。據其遺物及城基，大概在北魏之末及隋唐間，其城址建築亦與魯克沁舊城相同，故疑此二城即新唐志所述之南平、安昌二城遺址也。」結云：「南平城在今雅爾湖東南七十里之讓布工尚，安昌城在今雅爾湖南三十里之柏克布拉克。」今姑存其說。

天山及天山縣 西州圖經云此道出天山縣界，新唐志云道至天山西南入谷。按元和志，天山縣東至西州一百五十里。圖經及新志雖不云經天山縣城，然磧中置縣，當爲大道所經無疑。況縣在州之正西，方向正合。黃文弼高昌疆域郡城考云：「天山縣，西域圖志以連木齊當之，非也。陶保廉辛卯侍行記謂當在托克遜，似頗近理。蓋托克遜距哈拉和卓一百九十里，此指繞經吐魯番之道；若直徑可減二十里。又在托克遜之東二十餘里有古址，……漢人名爲大敦子。審其陶片及形式，或爲唐代建築。……其南車轍道深丈餘，皆爲數百年前往來人所留，蓋此處適當東西交通之衢，且南北均爲天山，與元和志所述之地位與距離亦相合，故余以天山城在此。」按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二，述交通路線云：「托克遜台又南而西入山百里爲蘇巴什山溝。」正與新志所云「至天山，西南入谷」形勢相合。大敦子既有古城，在托克遜東二十里，黃說固有理據也。

復按徐松所謂「托克遜西南入山百里爲蘇巴什山溝」者，正即前文引西域圖志蘇巴什塔克條所述，蘇巴什山北谷口在托克三西南五十里者是也。此大山脈爲天山正脈向南疆分出之最大一支。（觀前引西域圖志可知。）考舊八三郭孝恪傳，伐焉耆，虜其王。太宗璽書勞之曰：「焉耆絕域，地阻天山，恃遠憑深，敢懷叛逆。」天山正脈在焉耆、吐魯番之北，不能阻唐兵，此所謂「地阻天山」當指此大支脈而言，即指蘇巴什山及庫木什阿克瑪山（銀山磧）等一系列之山

脈而言，則新志所謂「至天山，西南入谷者」即至今蘇巴什山也。此山北谷口在托克遜西南五十里，即在大墩子西南七十里，故置縣即名天山縣耳。（註九）唐志、郭孝恪傳之天山及天山縣所以受名之天山既皆即指蘇巴什山脈而言，山北口在托克遜西南五十里，即在唐代西州之西約二百餘里。唐志云西州西南百二十里至天山。按西州至天山縣已一百五十里。此「百二十里」顯有脫誤。前已提到西州至焉耆七百一二十里，簡稱七百里。而新志記此道里程總和只六百二十五里，必有脫誤無疑。今疑此「百二十里」之「百」上脫「二」字，則西州至天山二百二十里，全程總和七百二十五里，則無不皆合矣。

篤進城 前引慈恩傳卷一，西州西行有無半城、篤進城。考梁書五四高昌傳，置四十六鎮。篤進爲其一。則此城甚古，至唐初仍存，且名稱不異。馮承鈞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曰：「篤進必爲脫克遜今名之所本，可無疑也。」若然，則余頗疑唐之天山縣即本梁及唐初之篤進城，因城置縣，未可知也。

阿父師泉 慈恩傳卷二：「從此西行至阿耆尼國阿父師泉。泉在道南沙崖，崖高數丈，水自半而出，……行旅往來，隨衆多少，下有細巖……法師與衆宿於泉側。明發，又經銀山。」是在篤進城以西，銀山磧以東道上。今按國防研究院地圖，蘇巴什至庫木什之間有阿海泉及阿海泉山口(Arghai Bulak Davan)，地望與慈恩傳之阿父師泉相當，而有 Ar-Bu 音，殆即阿父之遺音歟？

交河縣 以上所考乃就新志所記路線而言，似不經交河縣。今按高昌之西有交河城，爲自古名城，唐亦置交河縣。且貞觀初平高昌時，始置安西都護府於此，詳後文安西府治龜茲條。元和志，交河縣在西州西北八十里。寰宇記同。元和志又云：「交河出縣北天山，水分流於城下，因此爲名。」即漢書西域傳所稱「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也。是形勢甚顯，易爲指證。西域圖志一四，「招哈和屯亦稱交河城，在吐爾番城西二十里。……招哈郭勒出其北。郭勒之水分道南流，環城左右，即漢時交河舊地也。北倚金嶺，峯巒層疊，經城西而迤南，形勢佳勝，民物殷繁。」一統志吐魯番卷古蹟目交河故縣條及山川

註九：黃文弼云托克遜大墩子南北皆有天山。南天山亦即指蘇巴什山而言。

目招哈河條，皆同。屬境目云：「同語譌交河爲招哈。徐松西域水道記云：「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爾湖有故城，周七里，即古交河城。」今人說者皆無異辭。按前人釋此城所在當以明永樂間陳誠西域番國志爲最早。志云：「崖兒城在土爾番之西二十里，二水交流，斷崖居中，因崖爲城，故曰崖兒城。廣不二里，居民百家，舊多寺宇，有石刻存，古爲率帥〔車師〕國王所居，後復立交河縣治。」此其形勢最顯豁，殆無疑矣。國防研究院地圖有燕木什 Yamshi。西城圖志一四，雅木什在招哈和屯西南十五里；一統志作五十里，誤。則唐代交河縣即在今圖燕木什東北十五里也。

唐交河縣既在今雅爾城，是在西州之西微北八十里，非真正西北也。其地固當西州西北通北庭之要道（見西州圖經），然交河爲自古名城，西通焉耆。則唐世由西州經交河縣亦通焉耆無疑。蓋即由交河西南行至天山縣，與前述之道接會耳。明陳誠西域行程記，由土爾番西行三十里崖兒城，住十七日。「由崖兒城南順水出山峽，向西南行……約五十里。」又「向西行平川地約行五十餘里有小城名托遜。」此即唐交河縣西南通天山縣之道也，約一百餘里。

焉耆又西渡河（今海都河）向西南行，約一百五十里至鐵門關（今關？），甚險隘，爲開元時代十三中關之一，以其當驛道也。張九齡所謂「鐵關千術，四鎮咽喉」者，是矣。關西置館。又西〔一百〕二十里至于術守捉城（今查爾赤地區？），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城（今英吉沙地區？），又五十里至龍泉守捉城（今英吉沙以西？），又六十里至東夷僻守捉城（今輪台縣西？），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城（今巴召或大勞場？），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城，又一百二十里至龜茲國（今庫車縣），置安西都護府。東去焉耆八百數十里，號稱九百里。龜茲東境又有泥師城，當大道，其地無考。

安西亦爲四鎮之一，及安西都護府之遷定與四鎮之列名，皆詳後文。

漢書九六下西域傳，龜茲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焉耆西至都護治所四百里，是龜茲焉耆相距七百五十里。魏書一〇二西域傳，焉耆國「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先後記程頗異。檢通典一七四，「安西都護府，本龜茲國也，大唐顯慶中置。」「東至焉耆鎮守軍八百里。」同書一九二邊防八焉耆條云：「南去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本注：今郡）

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寰宇記一五六安西大都護府條及卷一八一焉耆國條，全同。是唐人記程，焉耆龜茲間亦九百里，一云八百里也。唐初玄奘西行，由高昌經焉耆、龜茲、姑墨，出凌山，至熱海、千泉。慈恩傳卷二云，在阿耆尼國「停一宿而過，前渡一大河，西履平川，行數百里入屈支國界，舊云龜茲，訛也。」而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一詳之云：

「阿耆尼國……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里，至屈支國，舊曰龜茲。…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

又新二二一上西域傳龜茲國條亦云：

「自焉耆西南步行二百里，度小山，經大河二，又步七百里乃至。」(此據百衲本，中華聚珍本，「二百」譌爲「一百」。)

是尤唐人記程九百里之明據。然則唐人記程大抵爲九百里，前代計程或九百里，最少七百五十里也。而新四三下地理志末附通四夷道條述此段行程云：

「自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又二十里至于術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龍泉守捉，又六十里至東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護府。」(又同書四〇地理志安西大都護府目，亦云：「焉耆西有于術、榆林、龍泉、東夷僻、西夷僻、赤岸等六守捉城。」)

此段記事甚詳，極可寶貴，然行程總和僅六百三十里，與玄奘記程及通典所記以及新書西域傳所記相差太遠，即與漢書記程七百五十里者，亦差少一百二十里，必有奪誤無疑。然參之新志安西府目，此所述一關六守捉名稱次序當未奪譌，蓋僅里數有譌誤耳。今先就鐵門關之形勢與今地及安西都護府之今地論之如次，然後校正里數。

鐵門關 鐵門關爲唐代此地區重要關隘。唐六典六刑部司門郎中條，凡京城四面關而不當驛道及當驛道而非四面關者，皆爲中關。中關一十三，安西鐵門爲其一，重要可知。故岑參詩屢詠及之，舉列於次：

使交河郡獻封大夫：「鐵門控天涯，萬里何遼哉！」(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一)

題鐵門關樓：「鐵關天天涯，極目少行客，關門一小吏，終日對石壁，橋跨千仞危，路盤兩崖窄。」（同上）

天山雪歌送蕭沼歸京：「北風夜捲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漢月照銀山，復逐胡風過鐵關。」（同上參集二）

銀山磧西館：「銀山磧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同上）

火山雲歌送別：「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雲厚，……繚繞斜吞鐵關樹，氛氳半掩交河戍。」（同上）

宿鐵關西館：「那知故國月，也到鐵關西。」（同上參集三）

此即六典及新志所記之鐵門關無疑。據最後一詩，關西有館驛。又據題鐵門關樓詩，見此關形勢甚險，故爲要隘也。張九齡敕西州都督張待賓書（全唐文二八七）云：

「吐蕃背約，入我西鎮，……必與突騎施連謀，……諸處散下。鐵關千術，四鎮咽喉，倘爲賊所守，事乃交切。」

亦即此鐵門關無疑。（不知「千術」是否與「于術守捉」有關？）蓋其地東通焉耆，南通于闐，西通龜茲、疏勒、及碎葉，而關以鐵名，是必當交通要衝，且深險阻也。又考晉書七九焉耆國傳云：

「其地南至尉犁，北與烏孫接。……四面有大山，道險阻，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焉耆王）熙距戰於賁崑城，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熙率屬下四萬肉袒降於宣。」

是此鐵門之名甚古。蓋焉耆王熙先戰敗，已失國都，乃退屯尉犁，（時焉耆霸西胡，葱嶺以東皆服屬。）鐵門在焉耆城西南至尉犁道上，遮留谷又在其北十里也。尉犁在焉耆南百里，則新志云關在焉耆以西（卽西南）五十里，似不誤。然據玄奘所記焉耆至龜茲道甚平坦，僅靠近焉耆國處有一小山。西域記又云：阿耆尼國「四面據山，道險易守。」鐵門關者，蓋卽焉耆西南一山口，故云小山也。至於小山今地，西域圖志一五庫隴勒條：「庫隴勒……東北距哈喇

沙爾城一百八十里，山勢險峻，古焉耆以西諸國關隘也。山南海都郭勒（即河）繞而西流，山麓瀕河處，右山左河，徑極險窄，河南岸爲庫薩勒城。」又同書二三庫薩勒塔克（山）條，亦云「在哈喇沙爾西南一百八十里……勢極險峻，古焉耆以西諸國關隘也。」並以爲即唐書西域傳之「小山」所在。又丁謙晉書四夷傳地理考證云：「鐵門即水經注鐵谷關。（按酈注本作鐵關谷。）今哈喇沙爾西南百餘里有兩山對峙成峽，凡三十里，河經其中，其北口有大石嶺即鐵門，其南口即遮留谷也。」按清代地書所記，焉耆以西最近之山僅庫薩勒山，山在城西南一百八十里，前人以爲即鐵門關在此地區不爲無理。丁謙又云，張植進據之尉犁「乃渠犁之誤。……今庫勒爾城（按即前引之庫薩勒城）即漢渠犁。」（註十）所疑蓋甚是。新志「焉耆西五十里過鐵門關」者蓋「五十」上奪「百」字歟？今檢國防研究院地圖，焉耆西南有庫爾勒（Kuerhlei），在孔雀河南岸，其東北，河之北岸有鐵門關，正約在焉耆西南一百五十里，今之汽車道由焉耆西至此關，分爲南西兩道，西通庫車，南渡孔雀河，經庫爾勒至婼羌折西南至和闐，蓋真唐代鐵門關舊址矣。

安西都護府 府治龜茲國。一統志庫車卷古蹟目古龜茲國條云：「按龜茲故城雖不可考。然水經注城東西有川，則今之庫車城，烏恰特河流逕其西，額什克巴什河流逕其東，正與酈注所稱方位相合。又元史太祖紀尙稱龜茲，而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則曰庫徹，正與庫車音合，則庫車之即龜茲國都無疑矣。」其他各家所說皆同。惟西域圖志一五庫車條據古今志書所記里數，推論龜茲故城，「當在今額什克巴什郭勒之東，阿巴特、托和鼐間，而庫車特其西境耳。」按托和鼐在庫車東六十里，又東一百四十里爲阿巴特。是謂龜茲故城當在今庫車東百里左右。然圖志同卷中，釋前引新唐志各守捉城仍以庫車當龜茲城爲準，是則自相矛盾矣。按龜茲大城，當有其客觀條件，庫車之說較爲近是，圖志僅據史志所述里數推論，殊薄理據，蓋西北遠荒，里程不實，固難拘執也。況唐代記程亦九百里較近代記程九百八十九里者，不過數十里之差，固不足異也。

註十：檢漢書西域傳，焉耆、龜茲間七百五十里；渠犁西至龜茲五百八十里，則東至焉耆一百七十里，其地正當在今庫勒爾城。

至於新志所記各守捉城之今地殊難確指，但西域圖志一五對於此諸守捉亦頗有推測，茲引錄如次，並據統志喀喇沙爾及庫車兩卷之臺站目注其相距里數。

◎喀喇沙爾〔焉耆國、焉耆鎮〕〔今圖焉耆〕

(158)

○哈喇噶阿璣

(60)

○庫薩勒〔今圖庫爾勒Kuerhlei〕

(30)

○哈喇布拉克

(100)

○車爾楚〔于術在此地區〕〔今圖查爾赤 Charchi〕

(160)

○策特爾〔今圖且廸多 Chadir〕

(80)

○英噶薩爾〔榆林在此間，龍泉在此西〕〔今圖英吉沙 Yingkisha〕

(80)

○玉古爾〔古輪臺在此地區，唐東夷僻在此西〕〔今圖輪臺縣， Bugur〕

(100)

○阿巴特〔西夷僻〕〔今圖二巴召 Erhpachao? 或大勞場 Chol-Abad〕

(140)

○托和鼐〔今圖塔什子?〕

(80)

◎庫車〔龜茲國、龜茲鎮〕〔今圖庫車〕

此項臆測雖無所據。然唐代紀錄，兩國間距離較今日紀錄既僅數十里之差，且鐵門關以西皆行平川，則與今日鐵門關以西直向西行至庫車之汽車道當無大差異，殆可斷言，故此所測亦可能近是也。

又通鑑二〇〇，顯慶三年，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龜茲王布希畢歸國。「至龜

茲東境泥師城，龜茲大將羯獵顛發兵拒之。」此城地望無考。

龜茲國都城周十六七里，於高昌以西至葱嶺間最爲大國，亦爲唐置五鎮之中心，故安西都護府經常設治於此，統四鎮兵二萬四千至三萬人，西盡波斯皆隸屬焉。所謂四鎮者，安西、疏勒、于闐、焉耆；高宗末武后初，曾以碎葉代焉耆爲四鎮之一，兵威極盛矣。

龜茲大國，城周十六七里，見大唐西域記。唐六典五兵部卷，「磧西節度使，其統有安西、疏勒、于闐、焉耆，爲四鎮經略使。」通典一七二作：「鎮西節度使，寧西掘（？），統龜茲國、焉耆國、于闐國、疎勒國。」置屬國，仍置鎮兵也。故同書一七四，西州「西至焉耆鎮守軍七百一十里。」北庭府「西南到焉耆鎮守軍八百七十里。」也。又考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歷遊疏勒、于闐、焉耆，皆云漢軍馬領押守捉，「從疏勒東行一月，至龜茲國，即是安西大都護府，漢國兵馬大都集處。」時開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也。下云：「安西山〔四〕鎮名數，一安西，二于闐，三疏勒，四焉耆。」又慧超傳，歷舉疏勒王裴冷冷，鎮守使魯陽；于闐王尉遲曜，鎮守使鄭據；龜茲王白環，安西四鎮節度使郭昕；焉耆王龍如林，鎮守使楊日祐。是安西、于闐、疏勒、焉耆皆爲屬國，各有國王，唐政府遣兵駐守，各置鎮使以統之。安西鎮守使蓋即由都護節度使兼之也。舊一九八龜茲傳，長壽元年破吐蕃，復四鎮，「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用漢兵三萬人，以鎮之。」通典一七二云：鎮西節度使「治安西，二萬四千人，馬二千七百匹。」大約分駐諸鎮及守捉城，而安西爲駐兵大本營，故慧超云「漢國兵馬大都集處」。

然安西都護府初非置於龜茲，四鎮列名，前後亦不盡同。前史紀述頗爲參差。據大谷勝真安西四鎮之建置及其異同（周一良譯本，刊禹貢第一卷第十一期）、松田壽男碎葉與焉耆（楊鍊譯本，刊西北古地研究中）及松田壽男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貞觀十四年（西元640）八月，侯君集平高昌，置西州；九月置安西都護府於此。貞觀十六年（西元642），郭孝恪見以西州刺史兼充都護。二十二年（西元648）平龜茲之叛，遂移都護府於龜茲。旋因阿史那賀魯之叛，永徽二年（西元651）復內徙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三年（西元658）賀魯亂平，唐勢復振，

遂復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國，統轄四鎮，西盡波斯，並隸屬之。所謂四鎮者，本爲龜茲、焉耆、疏勒、于闐。咸亨元年（西元670）陷于吐蕃。調露元年（西元679）大築碎葉城，其時四鎮有碎葉，無焉耆。長壽元年（西元692）復安西四鎮時，與前同。開元七年（西元719），十姓可汗阿史那獻移駐碎葉，復以焉耆代碎葉，備四鎮之數，迄於唐衰。按此項結論大體可信。然安西都護府先後兩度在西州，而治所卻不相同。唐會要七三，「安西都護府，貞觀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侯君集平高昌國，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治交河城。」通鑑一九五，貞觀十四年九月，以高昌地置西州。……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則貞觀十四年始置此府，在西州境，但治交河城，不治西州治所之高昌城也。舊紀於此年九月書云，「乙卯於西州置安西都護府。」蓋就西州境而言耳。舊紀，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此蓋真在西州治所高昌縣耳。故會要云，顯慶「三年五月二日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國，舊安西復爲西州都督……以統高昌故地。」通鑑二〇〇，同。

以上所考皆通安西之驛道也。此外沙州西北通西州及焉耆又各有捷道。其通西州之捷道，乃由沙州向西微北行一百一十里至興胡泊，又一百三十二里至河倉城（今大方盤城），又三十里出玉門故關（今小方盤城），西北經白龍堆、大沙海（沙海之西北邊緣在今魯克沁東南九十里）亦至柳中縣，達西州，全程一千三百六十里，是爲大海道。道當大磧流沙，無水草，行旅困弊，殆少行者。

西州圖經云：

「大海道 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當〕流沙，人行迷誤。有泉井，鹹苦，無草，行旅負水擔糧，履踐沙石，往來困弊。」

考史記二三大宛傳「鹽水中數敗」。正義引裴矩西域記云：

「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乏)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也。」

又寰宇記一五六西州柳中縣條亦引裴矩書云：

「柳中路，裴矩西域記云：自高昌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草，人西行四面茫茫，道路不可準記，惟以六〔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以知道路。若大雪即不能行。兼有魑魅。是以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

此兩條所引，即爲西域記之同一段，惟省略不同，並各有譌奪耳。(註十一)按隋代瓜州即在敦煌，亦即唐代之沙州。觀裴矩所述此道情形，即西州圖經之大海道無疑。元和志四〇西州柳中縣，「大沙海在縣東南九十里。」蓋取道於此，故云大海道也。又通典、元和志、寰宇記之西州卷述西州東南所至如下：

通典一七四，西州「東南到敦煌郡一千一百里。」

元和志四〇，西州「東南至金沙州一千四百里。」

寰宇記一五六，西州「東南經少海，又渡磧至伊州一千三百里。」

三書所記似頗不同。元和志「金」字顯爲衍文。又寰宇記西州卷述四方四隅所至，惟東南一條與通典不同如此，其餘七條所至及里數皆與通典全同。寰宇記四至八到條絕大多數抄自通典，此處蓋同，且西州至伊州亦絕無一千三百里，則此「伊州」必爲「沙州」之譌誤無疑。所謂「經少海又入磧」者，「少」即「沙」之壞字耳。其里程，圖經作一千三百六十里，裴氏西域記及傳本志書作一千三百里或一千四百里者，出入固微。魏晝一〇一高昌傳，「去敦煌十三日行。」隋書八三西域高昌傳及寰宇記一八〇四夷車師國傳，全同。殆亦謂一千三百里也。通典作一千一百里者，蓋字之形譌耳。

此道西北端由西州東南經柳中縣，又東南九十里至大沙海，入沙磧中。又考元和志四〇沙州壽昌縣條云：

「玉門故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謂之北道，西趣車師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

註十一：周書五〇異域傳下高昌條：「自敦煌向其國，多沙磧，道里不可准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驗，又有魑魅怪異，故商旅來往，多取伊吾路云。」隋書八三西域高昌傳：「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又寰宇記一八〇車師國：「從武威西北有捷路」云云，與隋書西域高昌傳全同，惟一兩字之異。此三者皆卽錄取裴矩西域圖記無疑。其「武威」則「敦煌」之誤耳。

門戶也。」

唐之西州即漢之車師前庭，此亦即圖經之大海道矣。則此道東南端發自敦煌，西北出玉門故關。據前引沙州都督府圖經，由敦煌至故關，當經敦煌縣西北一百一十里之興胡泊，又一百三十二里至河倉城，又三十里乃至關，已詳前文。沙州至焉耆，亦有捷道，稱爲大磧路，惟行程不詳。

舊一九八西戎焉耆國傳云：

「其王姓龍氏，名突騎支。……貞觀六年，突騎支遣使貢方物，復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自隋末罹亂，磧路遂閉，西域朝貢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與焉耆結怨，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新二二一上同傳，略同。）

則前世自焉耆本有大磧路通中國，隋末閉塞，貞觀初又開之，不經高昌，則必直達敦煌無疑。

又按漢代經營西域之始，其南北兩道之北道乃由陽關向西，經鄯善、山國、尉犁至焉耆、龜茲，約行今羅布泊之北，沿庫穆河（庫魯克河）孔雀河而上至尉犁，達焉耆、庫車者，唐書此條所謂大磧路者，即此道也。漢道詳下文。

四 漢隋間通西域諸道及其與唐道之關係

瓜沙以東，州郡一線排列，自古稱爲河西走廊，地形所限，故古今通道亦大抵爲單線，且甚少變動。至於瓜沙以西，則因時代不同，頗多更易。今就史料解析可審知者，略述如次：

漢代經營西域，初期已有南北兩道。①南道，見漢書西域傳。由敦煌西出陽關至鄯善（羅布泊地區），行南山（崑崙山脈）之北麓、塔里木盆地之南緣，至于闐以西。②北道，由敦煌西出陽關，亦至鄯善，又西經山國（危須東二百六十里），危須國（尉犁東二百里），尉犁國（焉耆西南一百里），至烏壘、龜茲（今庫車）以西。此道行今羅布泊之北，略循庫穆河（又名庫魯克河）、孔雀河而上者。漢書西域傳，塔里木河以北諸國去長安之記程，即以此道爲準；然傳序所謂北道却非此道。蓋敦煌西北地區之車師（今吐魯番地區）、伊吾（今哈密地區）境接匈奴，漢人經營西域之始，爲避匈奴之鋒，

唐代涼州西通安西道驛程考

故先致力於敦煌以西地區，即鄯善、于闐、焉耆、龜茲諸國，是以最初南北道爲Ⓐ②也。逮已控制敦煌、鄯善以西諸國，乃以鄯善、焉耆爲基地，由南由西兩路進兵，與匈奴爭車師前國。已得車師，乃有Ⓒ道，即由鄯善向北微西行，至車師前國，再折西至焉耆、龜茲以西也。至西漢末年，更進而經營Ⓓ道，即所謂新道。係由敦煌玉門關西北行直至車師前國。由前國兩道分出，北至後國，西至焉耆、龜茲以西。其敦煌、車師間之交通里程，視舊道減半。漢書西域傳序所謂北道，非Ⓒ道，即Ⓓ道。蓋西域傳之內容所述各國去長安之里程乃較早期之記錄，傳序北道乃較後期之形勢也，故有不同。

東漢之世，又有Ⓔ道，即伊吾道。由敦煌北行千餘里至伊吾，折西行至車師前國，又北至後國金滿城。蓋漢人勢力更向東北擴展，已能控制最接近匈奴之伊吾也。此道見後漢書西域傳序。至於此序所謂南道，自即Ⓐ道，所謂北道，則Ⓒ道也。

至曹魏魚豢魏略西戎傳所述有南、中、新（北新）三道。其南道亦即Ⓐ道，中道即Ⓑ道，新道一稱北新道者，則Ⓒ道也。下及魏收魏書西域傳亦有四道之說，然自敦煌玉關西出，仍僅二道。一道由玉門出鄯善，乃Ⓐ道，或亦兼Ⓑ道言之。一道由玉門一千二百里至車師，則Ⓑ道也。至於由莎車西出之二道，乃前二道西出後之分歧申延，不得與前二道並列矣。

魏略、魏書皆不提Ⓔ伊吾道。然在兩晉北朝時代，伊吾道似爲通西域之主要幹線，用兵節使多出此途，豈史臣偶疏耶？逮隋世裴矩撰西域圖記序，有南中北三道。南道仍即Ⓐ道，北道即Ⓔ伊吾道，中道即Ⓑ道，亦即新道。惟Ⓓ道已荒蕪，殆至廢棄，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矣。然觀玄奘行程，由瓜州直至伊州，唐瓜州在敦煌東三百里，不經敦煌矣，蓋隋世已然。

唐以前諸史載西域通道有下列各重要史料，先錄列於次。

漢書九六上西域傳序：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

同書九六下西域傳下末段述漢與匈奴爭車師事有云：

「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爲柱置（補注引宋祁曰，通典「道」下有「通」字。）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繫於高昌壁，其時戊己校尉屯此。）」

後漢書八八西域傳序云：

「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北當作西，古人記事方向不能準。）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葱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破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此下與漢書西域傳序同。）

魏略西戎傳（三國志三〇烏丸鮮卑東夷傳末裴注引）：

「道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此兩句，通典作「前向西域有二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寰宇記，同。）從玉門關西出（通典作「出西」）經婼羌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通典寰宇記皆作廻）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通典寰宇記皆脫「西井轉」三字）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通典脫爲字）新道。（註十二）（以上，通典一九一邊防西戎總序全抄此段，惟頭兩句小異，已校如上。寰宇記一八〇，則抄通典。）……南道西行且志國，（沙曉箋注曰，志爲未之訛。）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扜彌國，渠勒國，皮兜國，皆并屬於闐。……中道西行尉梨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屬龜茲也。楨中國，莎車國……皆并屬疏勒。……北新道西行至東且彌

註十二：新，今本作西。集解曰：宋本作新。按通典抄魏略亦作新道。岑仲勉先生歷代西疆路程簡疏，據下文「北新道」云云，以作新爲正。極稿。

國，西且彌國，單桓國，畢陸國（沙曉曰即兩漢書之卑陸國），蒲陸國（沙曉曰即蒲類），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轉西北則烏孫，康居……。」

魏晝一〇二西域傳序云：

「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一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

隋書六七裴矩傳載矩西域圖志序曰：

「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麟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茲以次分別論述如次：

(甲) 先論兩漢書所記之通道。觀漢書西域傳序文，由玉門陽關西出至鄯善，再循南山（今崑崙山脈）北麓西行爲南道，今姑稱爲①道。其北道似由兩關西北行，至車師前庭，再循北山（即天山）南麓西行也。是惟南道由鄯善，北道則否。而據後漢書西域傳序，則所謂南北兩道皆至鄯善乃分途，即北道亦由鄯善出發，北至車師，再轉西並北山南麓也。至所謂「北通伊吾千餘里」者，則爲漢書西域傳序所未記之另一道。此道即後世所稱之伊吾道，始自敦煌，北達伊吾，非自鄯善分途也。今姑稱爲②道，俟下文再論之。今試先討論兩書序文所述之北道（即車師前庭道）是否自鄯善出發。

按後書文意甚明，不待論。而前書行文，固可解作由兩關西北至車師，不經鄯善；但亦未排除由鄯善北行至車師之可能性。今按漢書西域傳，媿羌「去陽關

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又鄯善國「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則陽關去長安四千五百里也。而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此國左近諸國，亦皆云去長安八千里上下，是此「八千」之數非形謬。則車師前國去陽關地區三千六百里也。按交河城在今吐魯番西二十里。北朝及隋唐記錄，高昌至敦煌僅一千三百里上下，最為正確。今據圖觀測，如由玉門陽關直西北行至吐魯番，無論如何，亦不能有三千里以上。然則漢書所記，由兩關至車師三千里以上者，必繞道甚多，非直達也。復按班氏又記，車師西南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焉耆去長安七千三百里。若由車師繞道焉耆至長安，當為八千一百三十五里，與車師至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者，僅十餘里之差，可斷此項記程，實繞道焉耆也。據上引魏略，中道由鄯善至龜茲，中經尉犁、危須、小王三國，皆屬焉耆。據漢書西域傳，尉犁在焉耆西南百里；危須在尉犁東二百里，焉耆東南；山國在危須東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接境。則魏略此道，即漢代已然。西域傳記龜茲以西諸國至長安之里數，固以此道為準，即車師及其左近諸國至長安八千里以上者，亦即繞道焉耆，行此道也。此殆漢代經營西域最初之北道，今姑稱為B道。蓋西域傳各國去長安之記程，乃較早期之材料，故塔里木河以北諸國去長安之里程皆以此道為準也。

又按鄯善國條又特記至車師之里數云：「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則由陽關出鄯善北向車師亦有一道。且鄯善國條有擊車師都尉及擊車師君。及車師條末述胡漢爭車師，首云：「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征和四年……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樓蘭即鄯善，此皆鄯善當車師道之明證。然則班氏此段序文，誠當如范氏序文作解，所謂北道者，亦由鄯善境與南道分途北行至車師，非由兩關即分途也。今姑稱之為C道。（范氏改寫班文，蓋亦覺班文易滋迷惑歟？）蓋伊吾、車師最接近匈奴，漢人經營西域先由鄯善向西取焉耆、龜茲，然後再東北與匈奴爭車師，屢得屢失，然後據有，乃置戊己校尉以鎮之耳。敦煌兩關至車師距離雖較近，然車師始非漢人勢力所能控制，故就漢人經營西域之歷史程序言，敦煌兩關西出之南北兩道，南道始終無變動；北道最開始之路線則由鄯

善西至焉耆、烏壘、龜茲；及車師已定後，乃可自鄯善西北經車師，西至焉耆、烏壘、龜茲以西，故西域傳序述北道以車師爲始矣。至西漢末葉元始前後始有新道，即班書西域傳下末段所述者，今姑稱爲①道。其道即由車師後王國南至前王國，再東南經五船北，直至玉門關，既避白龍堆之阨，且省道里之半。蓋繞經鄯善或更繞經焉耆至車師前王國皆三千數百里，北至後王國且四千里；而新道不及二千里也。前論班氏序文之北道當據後書序文作解，然班氏撰西域傳序時，此新道既已開通，則所謂北道者，固亦有即指由敦煌北至車師之可能，然則班氏序文之北道，固有②線之可能，亦有③線之可能，然絕非④線也。島崎昌西域交通史上的新道と伊吾道以爲此元始新道即魏略所稱之新道，亦即前文所考隋唐時代西州通沙州之大海道。此論誠是，可無疑矣。故通典三道之說全抄魏略，而云本有二道，「元始以後有三道」也。岑仲勉前輩歷代西疆路程簡疏，引通典以證魏略之新道北新道即漢書徐普欲開之道，是也；但云亦即後漢書北通伊吾之道，則非矣。

前漢後期，漢人僅能控車師，尙不能控制伊吾（今哈密）。後漢書西域傳，永平「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伊吾在敦煌正北微西，道里最近，既得其地，遂爲西城通道之要衝，故范書乃有伊吾一道，今姑稱爲④道。島崎昌云，范書雖不記新道，然通東漢之世，此道當仍暢通。觀魏略三道，有北新道而無伊吾道，可知也。然前據史記正義及寰宇記所引裴矩西域記述此道荒蕪難行，故「商賈往來，多取伊吾路。」然則最遲至北朝末年，新道已漸廢，行旅多從伊吾道矣。晉書一二二呂光載記，光伐龜茲將歸，高昌太守楊翰說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玉門，熙始拒之。是光取道伊吾至玉門，非取高昌玉門間之新道也。島崎引此，以證晉世伊吾路之盛，且見新道廢棄之漸，是也。復考魏書一〇一高昌傳，太和二十一年，高昌王馬儒求舉國內徙，高祖遣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使來迎，失期未會。保安還伊吾，旋復西行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會儒爲國人所殺。後王麴嘉仍乞內徙，乃遣孟威發涼州兵三千迎之，「至伊吾，失期而返。」此條更足證北朝時代伊

吾爲進出高昌之要道，新道絕不能與之爭，故至隋世裴矩撰西域圖記，此高昌敦煌間直達之新道，遂被描寫爲魑魅魍魎之域，荒蕪不可行矣。

(乙) 次論魏略西戎傳及魏書西域傳所記之通道。 魏略之南、中、北新三道：南道即漢代之南道，亦即Ⓐ道，最無問題。北新道由玉門關直西北至高昌，由高昌北行至車師後王庭，轉西北至烏孫、康居。又由高昌西行經焉耆至龜茲，與中道合。亦即由敦煌玉門關直西北行至今吐魯番地區，分爲北西兩支，北支越天山，至濟木薩，轉向西，行天山北麓；西支由吐魯番向西行天山南麓，至焉耆、葱嶺也。此道高昌至敦煌段及北支乃漢書所記元始前後之新道，即Ⓑ道，已詳前文。至於此道西支，亦即漢得車師前庭以後，新道開通以前之北道之一段也。至於魏略之中道，從玉門關西出經白龍堆至故樓蘭（即鄯善），又西經山王國、危須國、尉犁國至龜茲（今庫車縣）、莎車等國，出葱嶺。此即由今敦煌直西經白龍堆、羅布泊北岸，循庫穆河（Kum）至博斯騰湖南，又經焉耆西南境，庫爾勒，至庫車以西也。亦即漢書西域傳所記鄯善西北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至都護治所七百八十五里之Ⓑ道也。

至於魏書西域傳序所謂「本有二道，後更爲四」者。今按從莎車西出之兩道僅爲原有兩道之向西延伸，故不得謂爲四道。至於所述本有之兩道，其由玉門出鄯善者自包括漢書、魏略之南道Ⓐ，是否包括魏略之中道，亦即是否包括漢代最開始之北道Ⓑ，未可知矣。其由「玉門北行一千二百里至車師」者，則即西漢末年之新道Ⓓ，亦即魏略之新道也。蓋里程僅一千二百里，既不得釋爲經伊吾至車師，更不得釋爲經鄯善北轉至車師也。是則北朝時代，此Ⓓ道雖已不如伊吾道之盛，然仍爲一相當之要道，故魏書記之。且魏書西域傳，焉耆「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按此瓜州亦即敦煌。（看元和志沙州目。）傳又云，焉耆「東至高昌九百里。」則此二千二百里者，即由焉耆東經高昌，折而東南直至敦煌，不繞道伊吾也。此又當時記程取新道Ⓓ之一實例矣。

(丙)最後論裴矩西域圖記序所列之三道。圖記之南道即漢世之南道Ⓐ，亦即魏略之南道，自不待言。其北道蓋即後漢書所記之伊吾道Ⓓ，然似不經高昌。若然，則大同而小異矣。但事實上，伊吾西至高昌道仍暢通，亦曰伊吾道，見寰

宇記引裴矩記，詳下文。裴矩傳引裴矩記序，蓋文有省略耳。至於中道，由高昌西行，即漢書西域傳序所記之北道。然敦煌至高昌一段，取直道①，抑取伊吾道②經伊吾，則未明言。然史記大宛傳正義及寰宇記一五六皆引裴矩西域記（前考大海道已引之），云高昌東南至瓜州（即敦煌）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草，云云。前文已證即唐之大海道，亦即西漢末年所見之新道，並即魏略所記之新道。則裴矩傳載西域記序所謂中道者，即自敦煌西北至高昌一千三百里，然後折向西，經焉耆、龜茲也，是③道矣。然寰宇記引裴矩西域記述此一千三百里通道之險，接云：「是以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下文寰宇記作者即接云：「又一路，是縣（柳中縣）東南行，經大海之東，又東南度磧入伊州界，即裴矩所爲（謂）伊吾路也。」則裴矩所記伊吾路雖西北出天山至天山北路，然另支亦西至高昌；且由高昌至敦煌，取伊吾路者爲多，直接至敦煌者反較少也。

又按裴矩西域圖記序謂發敦煌有三道，其北道出伊吾者，固可解釋爲由敦煌郡治所之敦煌縣出發至伊吾，即唐之稍竿道也；但據慈恩傳，玉門關在瓜州（晉昌），玄奘西行由瓜州取莫賀延磧道，且見此道在隋世已暢通。又考隋書八四西突厥傳：「處羅大敗，棄妻子……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是隋世，玉關已在晉昌，與慈恩傳同。按晉昌城，唐之瓜州，在隋亦屬敦煌郡，故裴矩所謂發敦煌者，不一定指敦煌縣，其由晉昌城出發行莫賀延磧道者，亦得謂之發敦煌也。故隋之北道亦有指唐之莫賀延磧道之可能。

綜上所論，前考唐代瓜沙以西之驛道及捷道皆即漢以來之舊道。就驛道言，沙伊間之稍竿道，及伊州西至西州，皆漢世之④伊吾道也。沙西間之捷徑大海道，則漢之⑤道，所謂新道也。沙州至焉耆間之大磧道，則漢之⑥道，即最初之北道也。惟瓜伊間之莫賀延磧驛道，雖不知所始，然至遲隋世已然。至於漢以來最無變動之南道⑦，唐仍暢通，然非本文所考之範圍矣。

五 長安安西道在交通上之重要性

前撰唐代長安西通涼州兩道驛程考以明長安西至涼州之交通狀況。今復考涼州以西至安西都護府之交通路線如上文。合而言之，即爲唐代長安西通西域中亞之大孔道也。全線行程皆置驛，使騎急行，約一月可達。

涼州至長安有南北兩道，皆置驛，已詳另考。涼州以西亦置驛。驛名有可考者，本文第二三兩節亦已備論。岑仲勉前輩云：「漢唐在玉門以西，未見驛傳之記載。」（中外史地考證前言頁三。）意謂至元始置驛。按唐代玉門關在瓜州。關西之常樂縣西至沙州，北至伊州皆置驛。敦煌發現之沙州都督府圖經記此兩道之驛名驛距里數皆極詳。前文已詳引之，岑說不待辯自破。即就敦煌縣西之玉門故關言。其西亦置驛，如元和志四〇，西州柳中縣「當驛路程，極險固。」又唐詩紀事二三岑參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使呈高開府云：「曾至交河城，風土斷人腸，塞驛遠如點，邊烽互相望。」又宋史四九〇，高昌傳載王延德使高昌記，納職西行三日至鬼谷口、避風驛，時在宋建國二十二年，自是唐驛，則唐代伊州以西道上亦置驛無疑，皆玉門以西也。岑氏以爲唐代玉門關西不見驛傳，非也。

關於使騎急行所需之時間。通鑑一九七貞觀十八年紀云：

「九月……辛卯，上謂侍臣曰，（郭）孝恪近奏稱八月十一日往擊焉耆，二十日應至，必以二十二日破之，朕計其道里，使者今日至矣。言未畢，驛騎至。」

按下文書「冬十月辛丑朔。」則此九月辛卯爲九月十九日或二十日，若果以八月二十二日破焉耆，則使者在途約二十七八日。安西又在焉耆西八九百里，則安西至長安使騎急行，蓋稍逾三十日也。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詩（全唐詩三函八冊參集一）云：「西來誰家子，自道新封侯，前月發安西，路上無停留。」此亦安西至長安約需一月之旁證。

道中情形，大抵自甘州以西始涉石磧，而玉關、伊州間之莫賀延磧，伊州西州間之大患鬼魅磧，情況最爲惡劣，行旅常爲水草而憂，駝馬亦須特別裝備。

五代時，高居晦使于闐，有記，（五代史記七四四夷附錄于闐國條引）云：

「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澁，木澁

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氈皮，乃可行。」

此見甘州以西石磧行旅須特別裝備。關於莫賀延磧之狀況，慈恩法師傳記之最詳，文長不具錄。舊八四裴行儉傳云：「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益迷。……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亦見莫賀延磧中氣候瞬息幻變不常。岑參諸詩詠沙磧行旅者甚多，其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詩云：「曾到交河城，風土斷人腸，……赤亭多飄風，鼓怒不可當，有時無人行，沙石亂飛颺，夜靜天蕭條，鬼哭夾道旁。」又初過隴山呈宇文判官云：「西來誰家子……前月發安西……七日過沙磧，終朝風不休，走馬碎石山，四蹄皆血流。」此蓋皆指伊州西州間之石磧而言，即大患鬼魅磧是也。又舊六九侯君集傳，高昌王麴文泰謂其國人曰：「唐國去此七千里，涉磧濶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舊八〇褚遂良傳，諫遠戍高昌曰：「高昌途路，沙漬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此則總莫賀延磧與大患鬼魅磧而言也。其西州以西又有銀山磧，焉耆至沙州之捷道名大磧道；而沙州西州間之大海道情況尤惡，已詳前文。

故此道交通不可謂平易，然行旅來往甚多，商業貿易甚盛，慈恩傳云：「涼州爲河西都會，……葱左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正藉此道也。故其時高昌與焉耆因爭道而交惡，唐亦以高昌閉道絕西域商賈而興問罪之師。

隋書六七裴矩傳：「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隋書二四食貨志略同，且云：「西域諸蕃往來相繼。」足見隋世中國與西域交通商貿之盛。慈恩法師傳語，見卷一。慈恩傳又云，在瓜州時，遇「一胡老翁，……極諸西路，來去伊吾三十餘返。」亦見此道行旅之盛。

復考舊六九侯君集傳云：「高昌王麴文泰時遏絕西域商賈，太宗……詔以君集……討之。」舊一九八西戎傳高昌國條云：「時西戎諸國來朝貢者，皆途經高昌，文泰後稍雍絕之。」故興討伐之師。又姜行本記功碑（粹編四五），數高昌之罪，首云：「杜遠方之職貢，阻重譯之往來。」職貢實卽商業貿易，侯君集傳所言最得其本質。只爲阻碍東西貿易，而萬里興師，足見商賈之被重

視。故魏徵雖反對招徠西域諸國使臣，然仍云：「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舊七一魏徵傳）也。不但唐爲商貿而伐滅高昌，高昌亦且先爲商貿而伐焉者。舊一九八西戎傳焉耆國條云：「貞觀六年，（焉耆王）突騎支遣使貢方物，復請開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許之。自隋末罹亂，磧路遂閉，西域朝貢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與焉耆結怨，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即其事也。

其後西域中亞諸國通使臣，貢方物，絡繹不絕，冊府元龜外臣部載之甚詳，蓋亦多循此道。直至唐末李茂貞據鳳翔，財力枯竭，仍藉此道通西域貿易而立國焉。凡此皆見此道在交通貿易上之重要性。

冊府元龜卷九六九至九七二外臣部之朝貢目及卷九九九外臣部之入觀目、請求目、互市目，載唐代四夷貢獻貿易甚詳。貢獻即變象之貿易也。

輯本九國志七李彥琦傳：「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彥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年，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出永樂大典一八三七）。」即此一事，足見當時西域商業貿易對中國經濟之重要性。

又當唐盛時，西州市場所見內地出產品之價格，較之內地價格相去亦不甚遠，足見物資流通甚暢，尤爲東西商業貿易甚盛之明證。

池田溫中國古代物價の一考察（史學雜誌第77編第一號），據大谷探檢隊所獲資料作交河郡物價表。余讀此表，注意數事。其一，有帛練行、綵帛行等。此皆內地產品，而在西州市場有專行賣之。其二，西州市場所賣內地紡織品之價格。茲錄數種如次：

常州布壹端 上直伍百文 次四百九十文 下四百八十文

益州半臂 段壹 上直錢四百五十文 次四百文 下三百五十文

梓州小練 壹疋 上直錢三百九十文 次叁百八十文 下叁百七十文

河南府生絰 上直錢陸百五十文 次陸百四十文 下陸百三十文

蒲陝州絰 壱疋 上直六百三十文 次六百二十文 下六百拾文

按此數種紡織品皆爲較高級之品質。至於普通紡織品之價格當較低。檢全漢昇

先生唐代物價的變動（史語所集刊第十一本）引通典七，「至（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疋二百一十文。」通鑑二一四，「開元二十八年，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疋亦如之。」新五一食貨志，「是時（天寶五載）海內富實，米斗之價錢十三，……絹一疋錢二百。」全文所引資料，絹僅此數條。而就米價言，此爲米價最低之時代，料想絹價亦以此時爲低也。內地絹價最低時爲二百文。上引交河郡物價亦屬前期，時代當不相遠。假若爲同時代之紀錄，則西市市場所賣內地各州之高級紡織物卽鍊綢等，其價高者僅爲內地普通紡織物絹價之三倍，低者不到兩倍。若非同時，則內地絹價不只二百文，是西市市場所賣內地各州之高級紡織物，其高於內地普通紡織物之絹價且不及此倍數。由此推之，若就普通紡織品之絹而言，西域與內地之價格，當不至相差一倍以上。故內地生產品在邊區之價格並不算昂貴驚人，此正顯示內地通至西域之交通甚便，物資遷貿不滯也。

至於唐人藉此道可控制西域中亞之交通樞幹，更不待論，故盛唐時代西北邊防軍大部份皆屯駐此道沿線之州縣軍戍也。

六 結 論

涼州（今武威縣）爲西北交通樞紐，置河西節度使，統兵七萬餘，爲西北軍政之重心。安西都護府（今庫車縣）統軍三萬，鎮撫西域，凡焉耆（今焉耆縣）、于闐（今和闐縣 Khotan）、疏勒（今疏附縣Kashgar）、碎葉（今 Tokmak，在 Issyk 湖之西 Frunze 之東）諸鎮及諸屬國，西盡波斯（今 Parsa 伊朗）皆屬焉。兩地皆爲唐代控制西北邊區及屬國之重鎮。其間相去五千里。茲綜上所考，述其行程如次：

由涼州西北行，經番禾縣（今永昌縣西），越刪丹嶺（今水泉子），至刪丹縣，置刪丹鎮（今山丹縣），蓋卽五代時期甘州回鶻所都，大食依賓墨哈黑爾所記之 Sandabil 也。又西至甘州治所張掖縣（今縣），東去涼州五百里。其地南通吐番，北達居延至回鶻衙帳，爲河西重鎮之一，置張掖守捉，統兵六千餘。州南有鞏筆驛。

甘州又西經建康軍（今高台縣西南四十里），統兵五千餘；又經福祿縣（蓋今新橋堡、

龍興關地區），至肅州治所酒泉縣（今縣），置酒泉守捉，東去甘州四百里。

肅州又西百里至天門關（今嘉峪關西黑山下），蓋即北宋時代所謂玉門關也。又西經玉門縣（蓋今赤金峽赤金堡地區），曾置玉門軍，統兵五千餘；五代時置玉門關。又西經沙頭故城至瓜州（今苦峪城，亦可能在布隆吉城），去肅州約五百里。

瓜州置墨離軍，統兵五千人，稱爲四鎮之東門。唐初玉門關在州西北五十里之瓠
麌河（今疏勒河或窟窿河）上，後蓋移至州城近處。由州城出玉關至常樂縣（今安西縣西）
置常樂驛。常樂西至沙州治所敦煌縣有南北兩道。由縣西南經魚泉、黃谷、空谷、無窮、其頭、東泉六驛，至沙州州城驛。永淳二年廢山南之黃谷、空谷、無窮三驛，而
於山北置懸泉驛，東接魚泉，西接其頭。此皆南道也。天授二年，以南道山險，遂盡
廢以上諸驛，改取北道，即由常樂直西行，經階亭、甘草、長亭、白亭、橫澗、神泉
(後更名清泉)六驛至州城驛。由敦煌東去瓜州，取北道三百一十五里，南道稍迂。城
內置豆盧軍，統兵四千五百人。

瓜沙兩州，各有道通伊州治所伊吾縣（今哈密縣），皆置驛。沙伊道曰稍竿道；瓜伊道曰莫賀延磧道，一曰第五道。高宗武后時代，二道交替使用。第五道者，由常樂縣西北行，經新井、廣顯、烏山、雙泉、第五諸驛，入莫賀延磧，又經冷泉、胡桐二驛
至赤崖驛，置赤崖戍，又兩驛至伊州，東南去瓜州九百里。明清大道及今日汽車火車
道即大抵循此古道而行也。稍竿道者，由沙州西北行，經興胡泊，河倉城（今大方盤城），玉門故關（今小方盤城），折北行經鹹泉戍至稍竿館，置稍竿戍，又北至伊州，南
去沙州七百里。兩道並通，大抵取第五道爲多。

伊州西至西州有南北兩道。北道由伊州直西經納職縣（今 Lapchuk，即四堡），行
大患鬼魅磧中，至避風驛（蓋今十三間房東南），又經羅護鎮守捉城（今納呼），至赤亭鎮
守捉城（今七克騰木），東去伊州七百里。南道又稱伊西道。行今順納湖之南，亦至赤亭鎮，與北道合。故岑參詩屢稱赤亭道口也。赤亭又西經白力城（今鄯善縣），柳中縣、驛（古田地域，今魯克沁），至西州治所高昌縣（今吐魯番東七十里之阿斯塔拉，即二堡；或堡
西十餘里之哈喇和卓，即三堡），東去伊州九百里上下，唐宋志書謂七百三五十里者，非
也。城內置天山軍，管兵五千人。

西州向西微南行，經南平城，安昌城，至天山縣（今大敦子，或托克遜）。又由州城

唐代涼州西通安西道驛程考

向西微北行經交河縣（今吐魯番西二十里雅爾），古交河城也，折西南亦至天山縣。由縣西南入谷，經磧石磧，阿父師泉（今阿海泉？），銀山磧（庫木什山），磧西館，呂光館，張三城守捉（今榆樹溝？），新城館，渡淡河至焉耆鎮城（今焉耆縣），東去西州七百二十五里。城極大，衆流交帶，羣山外繞，極爲險固，爲安西四鎮之一。

焉耆又西渡河（今海都河）約百五十里至鐵門關（今闕？），爲開元時代十三中關之一，以其當驛道也。張九齡所謂「鐵關千術，四鎮咽喉」者，是矣。又西經于術（今查爾赤地區？），榆林（今英吉沙地區？），龍泉，東夷僻（今輪台縣西？），西夷僻，赤岸六守捉城，至龜茲（今庫車縣），東去焉耆鎮八百數十里，號稱九百里。

龜茲置鎮，亦爲安西四鎮之一，太宗貞觀十四年平高昌，始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旋西遷至龜茲，不久廢。高宗永徽二年復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城，顯慶三年，唐勢復振，仍遷府於龜茲。地居焉耆、于闐、疏勒、碎葉之中心，統重兵，爲鎮撫西域之總部。

以上所述，自安西都護府東至涼州約五千里，至長安約七千里，皆置驛。此驛道大抵皆漢以來之舊道，其沙伊間之稍竿道及伊西間之一道，即漢世之伊吾道也。瓜伊間之莫賀延磧道，則隋以前不知何時所開者。又沙州直西行經塔里木河北岸至焉耆，稱爲大磧道，則漢世最初通西域時之北道也。沙州西北有捷道，經玉門故關至西州一千三百六十里，稱爲大海道，則漢世所謂新道也。然隋唐時代，此道多沙磧，乏水草，行旅維艱，蓋幾廢棄矣。故唐通西域之主要路線仍僅取莫賀延磧之大驛道也。

此驛道由安西都護府東經涼州，至長安，雖甘州以西多行沙磧，乏水草，多風險；然行旅不絕，商業交通甚盛，不但爲唐室控制西域中亞之大孔道，亦爲國際貿易、文化交流之大動脈。故此道之交通價值至高，對於唐與西域中亞之政治外交關係，經濟供求，文化交流，皆具重大作用，視爲唐代前期中國第一重要之國際交通路線，可也。

民國六十年五月三日初稿，二十七日增訂畢功，時端陽節前一日。

六月二十四日增寫第五節，並再度訂正完稿。

補 記

六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校稿完畢。有四事欲作補訂；但恐原版改訂太多，致手民誤
— 398 —

植，故只作補記如次：

其一，本文第77頁論墨離軍之地望。通典、元和志皆云在瓜州西北一千里，去河西節度使治所之涼州一千四百里。此兩項里數無法契合。前文就瓜州刺史例兼墨離軍使之制度及此道各州城皆置軍或守捉之事實，論定此軍即在瓜州城，東至涼州正爲一千四百里；其一千里者爲誤書或字譌。頃檢唐會要七八節度使目，「墨離軍本是月支舊國，武德初置軍焉。」或者，唐初就月支舊國置軍在瓜州西北一千里。其後移就瓜州城，例以瓜州刺史兼充軍使，通典、元和志合先後事書之耳，不覺自歧也。

其二，本文第86頁論稍竿道行程，引元和志壽昌縣目，「玉門故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謂之北道，西趣車師前庭及疏勒，此西域之門戶也。」一條，以證沙州、伊州間之稍竿道當經興胡泊與玉門故關。按沙州西北直通西州之大海道，即漢世之新道，由敦煌西北直達車師前國者。此道經興湖泊、玉門故關無疑，惟此道，唐世已荒廢，少行之者，詳第 107 頁大海道條。元和志此條所記仍即指大海道而言，不過直錄前代地志原文，非謂唐世商旅仍盛行也。故不得因唐世大海道行旅絕少，遂謂此條係指沙州北至伊州之稍竿道而言也。今爲謹慎計，此處結論只能云，稍竿道由沙州州城驛向北微西三百三十六至鹽泉戍，爲沙伊兩州分界處；又經稍竿館、稍竿戍凡約三百六十四里至伊州。

其三，本文第90頁納職縣條，論其地在伊州之正西；而元和志、寰宇記皆云納職縣東北至州一百二十里。今續檢沙州伊州地志殘卷有納職縣條，正作「東去州一百廿里」，無北字。

其四，本文第 117 頁論玉門關以西亦置驛。茲續得兩條佳證。西嶺定生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之均田制施行狀態引2598號文書云：「一段貳畝，以城西五里申石渠，東驛田，西至渠，北至渠。」又引2914號文書云：「尚賢鄉和靜畝一段二畝，城東二里七頃渠，東渠，以南驛田，北渠。」是西州有驛田，自置驛。又唐會要七三安西都護府目：「顯慶二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大總管蘇定方大破賀魯於金牙山，盡收其所據之地，西域悉平。定方悉命諸部歸其所居，開通道路，別置館驛。」是西域諸部皆置館驛，不限於唐之正州也。

參考書目

本文取材除正史、通鑑、政書、地書、詩文、碑刻等基本史料及清代地志工具書外，又參考下列諸考古史料與論著。清人西疆紀程之書與近代中日及西方學人研究中國西疆之論著甚多，愧未能盡事搜集也。

1. 沙州都督府圖經 鳴沙石室佚書本（羅振玉編）
2. 西州圖經 鳴沙石室佚書本（羅振玉編）
3. 沙州伊州地志殘卷 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唐光啓元年書寫沙州伊州地志殘卷に就いて錄本
4. 嵩煌錄 敦煌石室碎金本（羅振玉編）
5. 莫高窟石室秘錄 羅振玉編
6. 敦煌遺書活字本第一集 羽田亨編
7.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 許國霖編
8. 大唐西域記 玄奘撰
9. 慈恩法師傳 慧立撰
10. 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 道宣撰
11.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 藤田豐八箋釋 大日本佛教全書本
12. 西域行程記（明）陳誠撰 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輯本
13. 西行記稿（清）楊炳堃撰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舊鈔本
14. 西北叢編（民國）林競撰 中國文獻出版社出版
15. 魏略西戎傳箋注 沙畹撰、馮承鈞譯 刊史地叢考（商務印書館出版）
16. 西突厥史料 沙畹撰、馮承鈞譯 商務印書館出版
17. 高昌和州火州哈喇和卓考 伯希和撰、馮承鈞譯 刊史地叢考（商務出版）
18. 玄奘沙州伊州間之行程 斯坦因撰、馮承鈞譯 刊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商務出版）
19. 「興胡」名義考 羽田亨撰 刊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上卷
20. 安西四鎮之建置及其異同 大谷勝真撰、周一良譯 刊禹貢第一卷第十一期。
21. 碎葉與焉耆 松田壽男撰、楊煉譯 刊西北古地研究（商務出版）
22. 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學的研究 松田壽男撰 早稻田大學出版
23. 唐代蒲昌府文書の研究 日比野丈夫撰 刊東方學報京都第33冊
24. 西域交通史上の新道と伊吾路 島崎昌撰 東方學第口輯
25. 中國古代物價の一考察 池田溫撰 刊史學雜誌77編第1號
26. 賢書四夷傳地理考證 丁謙撰 刊蓬萊軒地理學叢書（正中書局出版）
27. 西域地名 馮承鈞編 中華書局刊本
28. 高昌城鎮與唐代蒲昌 馮承鈞撰 刊中央亞細亞創刊號
29. 高昌疆域郡城考 黃文弼撰 刊國學季刊第三卷第一期

30. 誤傳的中國古王城與其水力利用 岳仲勉撰 刊中外史地考證下冊
31. 從嘉峪關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紀程 岳仲勉撰 刊中外史地考證下冊
32. 歷代西疆路程簡疏 岳仲勉撰 刊中外史地考證下冊
33. 吐魯番一帶漢回地名對證 岳仲勉撰 刊史語所集刊第十二本
34. 兩關雜考 向達撰 刊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書）
35. 兩關遺址考 勞幹撰 刊史語所集刊第十一本
36. 唐代物價的變動 全漢昇撰 刊史語所集刊第十一本

唐代涼州西通安西道骨程考

唐代涼州安西道驛程圖

圖例

- | | | | |
|----------|---|--------|-----|
| 唐代府州治所 | ◎ | 本文所考驛道 | —— |
| 唐代軍縣治所 | ◎ | 其他路線 | —— |
| 唐代鎮戍等小地名 | ○ | 關 梁 | 三 |
| 唐代館驛 | △ | 山 穎 | 上 |
| 現代縣治 | ● | 今地名 | () |

